

研究論文

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 社會不平等，1992-2007

林宗弘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zoo42@gate.sinica.edu.tw）。筆者首先感謝香港科技大學吳曉剛教授的指導，本文曾於2008年12月於台灣社會學會宣讀，感謝謝雨生教授的評論、蘇國賢教授與蔡明璋教授的協助，數據修改後在2009年6月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二屆勞工研討會第二次發表，感謝謝國雄教授的評論與張晉芬教授的意見；同年10月15日於台大社會系以此為講題，感謝劉華貞、何明修、藍佩嘉、曾熾芬、林國明等教授的意見。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本文已參照審查意見進行修訂，仍有錯誤概由筆者負責。

收稿日期：2009/8/3，接受刊登：2009/12/2。

中文摘要

東亞新興工業社會如台灣，是否已經走向後工業化或者全球化的趨勢？本文比較了新馬克思主義、後工業主義與全球化理論等三派主要的社會轉型分析，發現三派理論在社會轉型的動力、階級結構的改變、階級流動的變化、勞動市場性別分工的變遷、收入分配的趨勢與階級政治的後果等方面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假設。根據台灣的官方統計數據與1992-2007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樣本，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類型劃分，本文的分析發現：首先，在過去近二十年間，台灣的階級結構發生了相當的轉變，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專業技術人員擴張，「黑手變頭家」與「頭家娘」現象則在消逝中。其次，在階級流動方面，父母的階級位置對子女階級繼承的影響有限，階級流動越來越依賴文化資本的代際傳遞。第三，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女性勞動力大量進入專業技術位置，男性體力工人與自僱者的收入相對下滑，可能縮減了兩性之間的工資差異。最後，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平等主要來自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但非技術工人與技術工人的差異也在擴張，資本與技術擁有者的利益提升，可能是貧富差距惡化的兩個主要來源。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變遷，雖然仍具有無產化的特徵，但後工業化才是主要的轉型軌跡。

關鍵詞：社會階級，社會階層化，新興工業國家，所得分配，社會變遷

**Post-industrializing Taiwan: Changing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Inequality, 1992-2007**

Thung-hong L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new industrial countries (NICs) in East Asia are following the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claimed by post-industrialism and/or globalization theorists. I compare three approach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o-Marxist, post-industrial, and globalization) and examine their various hypotheses in terms of social momentum, class structure, class mobility, gender and class inequality, and class politics. Using a neo-Marxist schema to analyze sampled datasets from the 1992-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I found (a) a stable percentage of unskilled workers, declining percentage of self-employed, and an increasing percentage of experts; (b)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have become the major source of class mobility; (c) labor market gender segmentation has been reshaped and wage discrimination has decreased slightly; and (d)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unskilled workers is still significant; the inequality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unskilled workers is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social change in NICs such as Taiwan has primarily followed the pos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ed economie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Keywords: social class, social stratification, NICs,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change

一、前言

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在最近二十年間似乎出現了重大的轉型，這次轉型的性質與趨勢究竟為何？與經濟起飛時期的階級結構以及社會不平等有何差異？過去有關社會階層化的研究，指出台灣工業化過程的兩個特徵：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無產化（proletarianization），農民及其子女大量進入藍領工人階級（文崇一 1989；謝雨生、余淑娟 1990；蔡瑞明 1997），另一方面是生產者對抗無產化的中小企業創業行為，也就是「黑手變頭家」的現象（謝國雄 1989；熊瑞梅、黃毅志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6a；許嘉猷、黃毅志 2002）。對台灣活躍的中小企業的解釋雖不相同，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特殊的彈性生產網絡（柯志明 1993；陳介玄 1994；許嘉猷等 1994）、支撐小商品生產的無酬家屬勞動「頭家娘」與大量低薪女性勞動力（黃富三 1977；李悅端、柯志明 1994；高承恕 1999；呂玉瑕 2001），或許是導致階級結構中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歷久不衰，甚至是支持台灣經濟發展與對外貿易成長的重要因素。

然而，過去二十年來台灣資本外移與產業轉型的衝擊，使原有的階級研究成果與台灣的社會變遷之間，出現相當大的落差。當許多研究者追隨台商的生产網絡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從事研究的同時（吳介民 1996；龔宜君 2005），台灣本地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趨勢已經出現了鉅變，社會學者似乎未能及時解釋這次轉型。當社會理論家未能與言時，其他通俗理論自會介入公共政策的爭論（Block 1990）。台灣階級研究的弱勢與經濟社會學焦點的外移（蔡明璋 2006；蔡瑞明 2008），將這片空白留給了許多通俗的趨勢大師，「下流社會」、「M型社會」成為大眾傳播媒體上的話題（大前研一 2007），並且引導了公

眾的政治選擇。

本文試圖回到鉅觀的社會轉型理論，探討台灣過去二十年間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轉型。筆者回顧了當前仍具相當影響力的三大社會轉型理論：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比較這三大理論流派對階級結構轉型、階級流動、階級與性別不平等，以及階級政治所提出的對立假說，以台灣的官方統計數據與1992、1997、2002與2007年等四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以下稱爲《社會變遷》）社會階層化問卷的樣本來檢證三個競爭的理論。台灣社會是否如這三派社會理論家所言，正在遭受無產化、後工業化或是全球化的衝擊？

二、工業社會的轉型：理論回顧與比較

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是解釋當代工業社會變遷的鉅觀理論中的重要流派，並且對階級結構、貧富差距與階級政治的轉型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本文的理論回顧部分，並不打算將這幾派學者的爭論一網打盡，而是集中討論三個學派對於階級結構、階級流動、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分工、階級不平等與階級政治所做出的對立論證。如 Erik Olin Wright（1997）所言，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甚至全球化理論），對階級結構的變遷提出了可藉由量化或質化方法驗證與否證的假說，這些理論的各個假說之間並非全無矛盾或模糊之處，彼此亦非全然對立，但至少給了隨後的社會研究者一張基本的社會變遷地圖。

有關台灣社會是否無產化（謝國雄 1989）、後工業化（李碧涵 1994, 1996a；黃志隆 2005；蘇國賢 2008）或探討全球化衝擊的文獻，

已經為我們提供不少追蹤社會變遷的線索，然而過去的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研究或階級分析，並未詳細辨別這三類文獻的對立假設（Goldthorpe 2002），台灣的階層化學者們雖有持續追蹤台灣階級結構與貧富差距的變遷（許嘉猷等 1994；蔡明璋 1996；黃毅志 1999；蘇國賢 2008），但是尚未能以相關數據來檢驗各學派之間互相矛盾的論證。因此，本文首先回顧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理論對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觀點，以澄清各派社會變遷命題的差異。

（一）馬克思主義的無產化理論

自《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問世以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無產化與階級鬥爭理論成為階級研究中爭論的焦點之一，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對階級結構兩極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預言：「中產階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包租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與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Marx and Engels 1998: 44）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宣言中十分明確地認為資本積累與去技術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將會導致無產階級的膨脹、中產階級向下流動、勞資雙方的貧富差距擴大，最終形成兩大分裂的陣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革命性鬥爭（Marx 1977）。

無論是在中產階級的變遷與階級意識的發展、或是在社會革命的起源方面，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點遭到來自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的批判（Miliband 1977; Moore 1966; Skocpol 1979; Tilly 1978; Wright 1985），也使得新馬克思主義部分接納了其他社會學理

論。一方面，1960到1970年代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部分吸納了韋伯（Max Weber）對現代官僚組織發展的理解（Weber 1958），將壟斷資本與國家的角色帶回理論視野（Baron and Sweezy 1966; Offe 1984）；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理論中生產者將被去技術化的論點，卻仍引起學術上的爭議（Braverman 1974; Edwards 1979; Burawoy 2005 [1979]; Block 1990）。

修正後的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以Wright的階級分析發展最為成熟。Wright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是多種生產模式或生產關係相互滲透所形成的階級結構（Wright 1985, 1997）。從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工具、國家社會主義下的組織資產以及社會主義下的技術資產等三種剝削性資產出發，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得以具體劃分出六到十二種階級位置。雖然Wright部分接納了韋伯的支配做為階級分析的基礎，並且認為壟斷資本將導致經理人與領班的膨脹（Wright 1985），然而在比較無產化理論與後工業理論時，新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延續勞動過程去技術化的論證，認為資本積累與去技術化將導致階級結構中專家與技術工人的萎縮（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S179），而教育體系無法矯正，反而符應了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再生產（Bowles and Gintis 1975）。結果，在新馬克思派之後一系列對已開發經濟體的階級結構比較研究中，去技術化的強無產化理論被一再否定，反而證實了後工業化的社會轉型趨勢（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1997）。

在1970年代依賴理論的影響下，對東亞新興經濟體中階級結構的早期研究，也是以無產化理論為主。例如Frederic C. Deyo等（1987）的東亞研究，蔡瑞明（1997）對台灣數據的韋伯派階級分析、以及Koo（1990）對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分析等（Roy 1984; Walton 1987）。然而，東亞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了區域研究的轉向。雖然研究者普遍同

意出口導向經濟體中存在大規模剝削低薪工人、特別是非技術女工的現象，焦點卻非階級結構無產化的趨勢，而是相對於其他地區，東亞為何能夠擺脫低度發展的陷阱（Barrett and Whyte 1982; Haggard 1990; World Bank 1993）。台灣加工出口部門例如成衣、玩具與電子產業所仰賴的中小企業彈性生產網絡（Piore and Sabel 1984;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柯志明 1993; 陳東升 2003），與發展國家主導產業升級的理論（Johnson 1982; Wade 2004 [1990]; 王振寰 1996），成為區域研究學者關注的重心，對台灣勞動過程或階級結構的分析基本上印證了「黑手變頭家」的現象（Yu and Su 2004; 謝國雄 1989; 許嘉猷、黃毅志 2002），並且探討了女性無酬家屬勞動的顯著作用（呂玉瑕 2009）。此外，1980年代中期以來第三波民主轉型的衝擊，使社會學者將焦點轉向政治現代化理論裡中產階級形成、社會運動興起與民主轉型之間的關聯（Huntington 1991; Wang 2002; Tsai, Fan, Hsiao and Wang 2008; 蕭新煌 1989, 1994）。

在過去台灣社會學界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研究的重要學術成就上，出現了研究時間、問題意識與社會現實的落差。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有關階級結構的研究雖然證實台灣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的比例偏高（黃毅志 1999），並對支持台灣工業化的特殊產業結構或社會網絡提出有力的解釋（陳東升 2003; 李宗榮 2007），後繼的社會階層化研究者卻很少追問：若是台灣的資本持續集中化，台灣的勞動者是否仍面對無產化的命運？

近幾年來，在台灣媒體關注的焦點與社會學研究的議題上，無產化理論似乎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台灣的中產階級真的在向下流動嗎（蔡明璋 2006）？台灣是否已經開始朝後工業化轉型（李碧涵 1994; 鄭陸霖 2004; 蘇國賢 2008），導致結構性失業與中小企業消失的趨勢？產

業轉型的後果是否已經影響了教育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孫清山、黃毅志 1996a, 1996b; Liu and Sakamoto 2002；謝雨生、黃美玲 2004；章英華、黃毅志 2007）？在所謂全球化的經貿開放政策衝擊下，台灣的階級結構是否會彈性化或再次無產化？固然，所謂的M型社會之流不過是無產化理論的劣質模仿品，這些問題卻早已成爲公眾爭論的焦點，雖然許多社會階層化的研究旁敲側擊，在無產化理論與其通俗版本之外，我們仍缺少一個解釋台灣階級結構變遷的理論架構。

（二）後工業主義與新階級理論

如Esping-Andersen（1999）所言，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度過了去農業化與工業發展的高峰，而迅速朝「去工業化」轉型，一方面各國的工業資本迅速外移，服務業產值與就業人數迅速膨脹；另一方面卻使得失業率與社會福利開支居高不下。後工業化的衝擊，已經導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產業轉型與福利政策等各方面，被迫處理棘手的政治經濟難題，例如高等教育投資擴張、稅收體制的改革、勞動體制與福利政策的修訂等等。

在Denial Bell的經典作品裡，提出後工業轉型在階級結構方面的幾項特徵：首先，是就業結構由工業迅速轉向以服務業爲主；其次，專家與技術官僚成爲政治經濟意義上的新統治階級，或至少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最後，理論知識成爲產業研究發展與國家政策制定的核心（1976: 14-27）。Bell的論點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引起社會階層化學者的廣泛迴響，一方面，社會流動的研究者將重心放在後工業的轉向與高等教育擴張對階級流動所造成的效果（Treiman 1977;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另一方面，後工業理論也對無產化理論的階級結構預測提出了

一系列的挑戰（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1997）。

在後工業理論中最突出的論點是知識份子作為一個崛起中的新階級，將對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與階級結構帶來重大衝擊。反過來說，所謂的新階級理論家也樂於將後工業理論視為其分支（King and Szelényi 2004）。新階級理論最初來自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與德加斯（Milovan Djilas）對蘇聯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的批判（Djilas 1983; Trotsky 1973），原指掌握暴力手段與國家組織的官僚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剝削階級，第二代的新階級理論，則是指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掌握再分配權力的技術官僚與知識份子成為內部分化的統治階級，並導致黨國官僚與工人之間的對立（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 Szelényi 1982; Wong 1996）。Alvin Gouldner（1979）更進一步認為，無論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中，知識份子都在朝奪權之路邁進。因此，資本主義大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國家技術官僚與中產專業階層的擴張，都可以被視為新階級歷史性崛起過程的表現（King and Szelényi 2004）。

以產業升級中技術資產的擁有者、或知識份子權力上升為核心，後工業理論發展出與新馬克思主義無產化理論十分不同的推論。首先，後工業化將會導致中產階級裡專業技術人員而非管理人員的擴張，但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將會持續緩慢地萎縮（Wright 1997）。其次，後工業理論與所謂「自由派工業理論」或現代化理論的共通之處，在於對階級流動的推論：現代化理論與後工業理論都認為社會經濟階級的代際繼承，將會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漸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賢能主義（Meritocracy）來挑選政治經濟菁英的教育流動（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19-24）。然而大多數後工業理論家並未暗示現代社會流動將會更為開放，相對地，後工業派教育流動的研究者較留意教育成就或所謂文化資本的再生產，以及不同的福利國家體制在階級與職業

流動上所導致的後果（Esping-Andersen 1999; DiMaggio and Mohr 1985; DiPrete 2002;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此外，無產化理論認為資本家一無產者的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來源。相對地，後工業主義者不排除另一種階級分化：技術資產所有者與非技術工人之間貧富差距擴大的可能性（Reich 1991）。例如Fred Block 指出，雖然美國工人在1980年代的技術水準整體上升，卻同時創造出了大量低薪與低技術的服務業職位，而且雷根時代對工會的打擊也促成製造業工資水準下降。然而中高階技術人員與低薪低技術人員的成長可以同時發生（自僱者減少才能使技術與非技術工人比例同時擴張），而兩者的薪資也可能有天壤之別（Block 1990: 183-187）。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後工業學者認為，後工業化將會挑戰工業社會中的兩性分工，隨著女性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的提高與藍領男性工人的減少，女性在專業職位上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Block 1990; Gorz 1985, 1994; Giddens 1999）。

最後，與Bell或Gouldner對後工業轉型樂觀的預期不同，某些後工業主義者對後工業社會的階級不平等惡化感到悲觀。例如Esping-Andersen認為，產業技術升級與全球化的衝擊，已經導致歐洲的工業組織（包括工會）崩潰與失業率居高不下，「低技術者很可能成為社會裡的輸家——要不成為失業者、要不成為低薪資的工人」（1999: 99），而且年輕一代受僱者的勞動條件並不會因為高等教育擴張而受益，相反地，先進資本主義體制正在邁向一個「更無產化的服務職業組成（a more proletarian mix of service occupations）」（1999: 107），這種悲觀的論調不僅模糊了後工業化與無產化理論的分野，而且反映了學術界對全球化衝擊的憂慮。

（三）全球化與資訊社會理論

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化的概念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界的新寵。從經濟學者的定義來看，全球化指的是各國之間商品、資本、勞動與服務市場的整合程度提升（Babb 2005），但是某些社會學者如Manuel Castells卻大膽預測所謂的全球化「不只是工業與後工業經濟之間的一次轉型，而是兩種知識生產模式之間的轉型」（Castells 2000a: 219），他稱之為由工業主義朝資訊主義或網絡社會的轉型。然而不幸的是，除了極少數作品（Castells的作品是其中之一）以外，大部分早期的全球化相關著作，在階級結構方面的論點嚴重缺乏經驗證據（Hirst and Thompson 1999），以至於著名階級理論家John Goldthorpe 評論道：「全球化的過程要不是沒有按照那些學者的預期方向發展，就是沒達到他們所預期的那種地步。」（Goldthorpe 2002: 3）¹

近年來由於經驗研究成果的累積，全球化理論家逐漸澄清了他們的階級分析觀點，而且與無產化理論或後工業化理論的分歧也更明顯。首先，他們認為全球化的動力來自資訊科技與網絡生產組織的發展，全球資訊社會的來臨導致生產組織的彈性化與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Babb 2005; Castells 2000a），在階級結構上會呈現出兩個後果：首先，長期穩定的正式僱傭關係會被短期非正式的僱傭關係替代（Giddens 1999; Huber and Stephens 2001; Korpi and Palme 2003），正式部門的工人階級

¹ Goldthorpe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筆者發現他所攻擊的「鉅觀全球化論者」（grand globalization theorists）包括Anthony Giddens、John Gray與Ulrich Beck的幾本重要著作*What is Globalization?*（Beck 2000），*The Third Way*（Giddens 1999）與*False Dawn*（Gray 1998）當中完全沒有提到「階級結構」一詞，也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職業或階級分析，僅偶然提及工會與產業工人所面對的衝擊。

會減少；其次，所謂的新貧階級（*lumpenproletariat*）會出現在產業外移的先進國家（Castells 2000a: 281-5; Goldthorpe 2002）。在最近對拉丁美洲階級結構的研究中，Portes 與 Hoffman 發現非正式僱傭的工人與自僱者或小雇主比例開始上升（Portes and Hoffman 2003），部分先進國家例如英國也有同樣的趨勢。² 最近針對拉丁美洲階級結構的追蹤研究更指出：女性已成為非正式部門中自僱者或低薪彈性勞動力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下的主要受害者（Hite and Viterna 2005）。

在新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裡，中產階級將會因為技術簡化而薪資下降，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貧富差距日漸兩極化（Braverman 1974），相對的，後工業主義者認為技術升級的趨勢會導致擁有人力資本的專業人士工資持續上升，貧富差距會出現在專業者與非技術工人之間（Bell 1976; Thurow 1999）。但是對全球化理論而言，全球化時代的貧富差距不再只是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而是少數控制全球金融與資訊網絡的專業精英與本土受僱者之間的分配不均（Castells 2000a, 2000b）。因此，所謂的中產階級也被分化成本土中產階級與全球化專業階級，前者的薪資水準將會因全球化的競爭下降，少部分全球化者將會獲得極大利益。

許多國家、區域與全球貧富差距的經驗研究不約而同證實了全球化導致國內貧富差距擴大（但國際貧富差距可能縮減）的趨勢（Firebaugh 2003; Milanovic 2005），例如Portes 與Hoffman（2003）對

²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Portes 與Castells 在內，多數研究者承認他們找不到非正式部門或無產化程度擴張的經驗證據。例如Castells 承認「如果我們將所謂的兩極化等同於職業地位兩端的擴張的話，那些廣為流傳的認為資訊社會中職業結構日趨兩極化的觀點並不符合這裡（七大工業國 G7）的數據（Castells 2000a: 234）」，而且他也指出自僱者的比例僅在加拿大與英國略有擴張（2000a: 236）。即使在拉丁美洲的階級結構中，自僱者與小雇主等非正式部門就業者的比例，在各國與各時期的變化也完全不一致（Portes and Hoffman 2003: 56-59, Table 3）。

拉丁美洲的研究發現，公部門（包括行政官僚與國有企業）高層管理者與跨國公司經理人在過去二十年中收入大幅提升，美國學者Perrucci與Wysong（2003）也發現高學歷的大公司經理人最近成爲美國的新富階級的一員，這些人被稱爲「全球企業階級」（global corporate class）（Kerbo 2006），「跨國資本家」（transnational capitalists）（Robinson 2004），「網絡人」（networkers）（Castells 2000a）或公私營企業的「資深執行長」（senior executives）（Portes and Hoffman 2003）等，被認爲是全球化時代新統治階級的重要成員。

多數全球化理論家都認爲歐洲傳統的工會政治力量正在被新自由主義政策逐漸削弱（Esping-Anderson 1999; Huber and Stephens 2001），然而最近針對歐洲福利國家的經驗研究結論並不一致，某些研究發現歐洲福利國家受經濟自由化衝擊有限，制度上也傾向維持現狀（Scruggs and Lange 2002），另一方面也有研究顯示歐洲各國工會的政治實力在選舉中變得較爲脆弱（Korpi and Palme 2003），但是各國的社會民主政黨與工會對全球化的反應確實不盡相同（Hall and Soskice 2001; Rudra 2002）。由於全球化理論家多數並不認爲全球化是必然的、或無法治理的潮流，許多學者都呼籲國際組織、各國政府與公民社會關注並防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嚴重後遺症（Esping-Andersen 1999; Held 1995; Giddens 1999; Castells 2000b）。

（四）無產化、後工業化或全球化？

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這三類文獻對於階級結構、階級流動、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區隔、階級不平等以至於社會轉型對階級政治的影響，做出了不同的推論或預測。筆者將無產化、後工業化與

全球化理論的對立觀點呈現在表1。本文關注的對立觀點主要在四個方面：（a）階級結構：無產化理論強調無產階級擴張與中產階級消失；後工業理論預測技術工人與專家的擴張與低技術工人及經理人的減少；全球化理論認為非正式經濟部門中自僱者與小雇主將會部分取代正式部門受僱者。（b）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無產化理論強調資產與無產階級的代際繼承；後工業理論預測教育成就或知識份子的階級再製將會取代經濟階級的繼承；而全球化理論對代際流動沒有提出具體的觀點，但指出本土中產階級向下流動、或由終生受僱者轉變成自僱者或非正式雇員的趨勢。（c）性別分工：東亞研究指出無產化與女工大量湧入工廠成爲低技術工人是資本積累的主要動力；後工業理論推測去工業化的過程可能導致女性佔據專業與技術位置，男性藍領工人反而受到更大衝擊；全球化理論則認為女性將成爲非正式部門中低薪彈性勞動力的主流。（d）貧富差距：無產化理論認為資本家與無產者的貧富差距將持續擴大；後工業理論強調受薪者中技術人員與非技術工人的內部分化；全球化理論強調全球統治階級與本土中下階級、以及正式與非正式部門之間的收入分化。最後，無產化理論認為工人階級意識將會提升；後工業理論家多認為針對福利國家去商品化政策的民主階級鬥爭將會持續（Korpi 1978, 1983; Esping-Andersen 1990），全球化理論則對新自由主義下傳統製造業工會的未來抱持悲觀的態度（Gray 1998; Giddens 1999），但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僅在結論部分討論階級政治的相關議題。

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理論並非完全互斥的理論，而或許該被視爲三種用來分析社會轉型的理念型（ideal-type），不可能完全符合現實，其中的不同趨勢在同一個社會、或三種轉型在不同社會也可能並存。表1的摘要雖然冒著過度簡化的風險，但是對澄清三種理論的矛盾

之處很有幫助。首先，無產化與後工業化理論對於技術工人與專家的比例，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論點（Wright 1997）；同樣地，全球化理論經常與無產化理論被混為一談，但兩者對於無產階級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做出了相反的假設（Castells 2000a）。因此，這些鉅觀的社會變遷理論不只是一種忽視個體、虛構的大論述（grand narratives），也不只是反映左派或右派立場的政治觀點，而是彼此矛盾、可以被經驗證據檢證與反駁的科學命題（Popper 1991）。換句話說，表1的 (a)、(b)、(c)、(d) 可以視為上述三種理論的四組平行假設，我們可用台灣的經驗數據來衡量社會轉型的實際方向。

表1 各派社會理論分析工業社會階級結構變遷的對立假說

	無產化理論	後工業理論	全球化理論
轉型動力	資本積累 / 去技術化 (資本升值 / 技術貶值)	去工業化 / 產業升級 (技術升值 / 權威貶值)	彈性化 / 去管制化 (資本與資訊升值)
(a)階級結構	工人階級增加，自僱者與中產階級專業者減少 (無產化)	工人階級減少，服務業與中產階級專業者增加	工人階級減少，自僱者與非正式僱用者增加
(b)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	中產階級向下流動，工人與資本家代際繼承程度上升	資本家與工人代際繼承程度下降，文化資本重要性增加	中產階級與工人向自僱者或小雇主流動
(c)性別分工	男工去技術化與女工湧入無產階級	男性體力工減少，女性專業者增加	女性湧入非正式部門成為自僱者
(d)貧富差距	資本家 / 工人收入兩極化，中產階級（技術工人）收入逐漸下降	中產階級專業者收入增加，非技術工人（包括服務業）收入降低	全球專業者與資本家收入增加，本土中產階級與工人收入減少
階級政治	階級意識提高，中產階級與工人結盟	階級鬥爭民主化，議題集中於福利國家	本土工會受打擊，福利國家撤退

其次，如許多後工業主義者與全球化理論家一再強調的（Bell 1976; Block 1990; Held 1995），筆者並不認為上述三種社會變遷理論之間具有連續或演化的關係。像Esping-Andersen（1999）指出後工業社會也

可能會再度無產化，而全球化理論當中也有不少是無產化理論在全球範圍內的延伸（Robinson 2004），甚至類似封建主義的中國戶口制度也可以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頑存（林宗弘 2007b）。因此，階級結構的變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過去的階級政治與經濟制度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甚至機遇（contingency）導致的結果，反映出特定歷史脈絡下各種生產性資產（productive assets）長期升值或貶值的相對趨勢。

筆者引用了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來驗證上述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的對立論述。選擇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是基於下列四項優勢：首先，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基礎為資本、技術資產與組織資產剝削或支配能力的變化，吻合無產化理論及後工業理論的分析架構（Wright 1997）。其次，若是採用新韋伯派的階級範疇，將會使資本家與高級技術或管理人員被歸入同一類，而製造業技術工人與服務業技術人員、以及第二與第三產業的非技術工人，則各被分為兩類（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模糊了社會變遷理論爭論的焦點；因此相對而言，新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較適合測試前述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理論的重要差異。第三，由於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曾以美國為例否定了無產化理論，證實此一模型並沒有理論導向的偏誤（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1997）。最後，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相關經驗研究也使用了類似分類方式（Lin 2007; 林宗弘 2007b），因此本文台灣階級結構的分析結果，未來將可以直接與中國大陸及香港數據作比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經驗研究中，新韋伯派與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差異不應該被過度誇大，反之，兩者的結論往往十分接近（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12-13; Wright 1997: 27; Chan and Goldthorpe 2007: 513）。例如，蘇國賢（2008）最近針對台灣階級流動的新韋伯派分析得到的結果與本文基本上相同（Yu and Su 2008），甚至孫清山與黃毅

志（1996b）以及章英華與黃毅志（2007）對台灣教育與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Index, SEI）關係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論。

本文各統計模型中所採用的階級分類如圖1所示：首先，我們依據生產工具的有無，將受訪者中的雇主與受僱者分開，其次，雇主方面依據權威的高低，又可以分為資本家、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Wright 1985）。此處小雇主的標準與中國大陸的個體戶相同，指的是雇工七人以下的小企業，與自營作業者兩類合併之後就等於個體戶（林宗弘 2007b）。在受僱者方面，筆者則依據權威與技術層級分為四類：非技術工人、技術工人與專家（有技術、無權威）、經理人或領班（無技術、有權威）、專業經理人（有技術、有權威、無資本）（Wright and Cho 1992）。筆者合併了1992年、1997年、2002年及2007年等四次《社會變遷》（TSCS）社會階層化問卷數據共計9,005個樣本，依據上述分類區分為七個階級位置，來檢驗前述三派理論的觀點。為求正文論證清晰，有關階級分類標準的細節、數據合併後的敘述統計、以及各章節中的統計模型與特性，請有興趣的讀者參閱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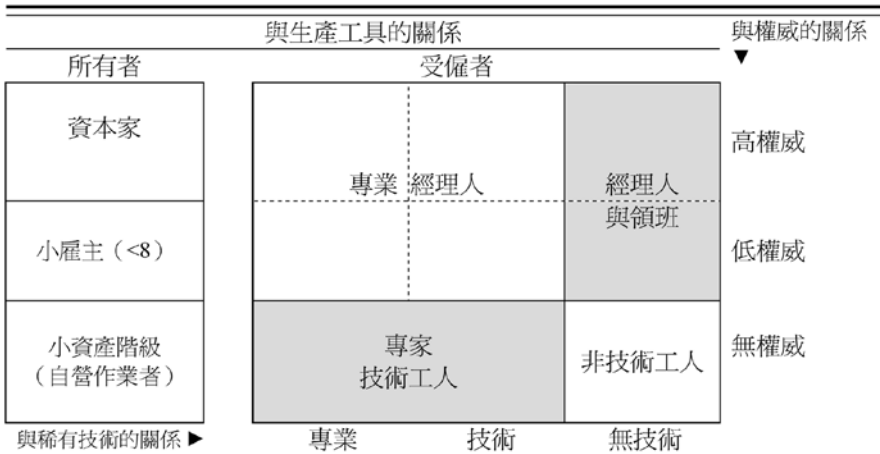


圖1 本文中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操作方式

註：修改自Wright（1985: 88）與Wright and Cho（1992）。

三、台灣階級結構的後工業化

究竟是無產化、後工業化還是全球化，比較符合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社會轉型的經驗？相對而言，本文中所呈現的經驗證據顯示：台灣過去二十年的社會轉型趨勢較接近後工業理論所指出的軌跡（李碧涵 1994；孫清山、黃毅志 1996b；鄭陸霖 2004；黃志隆 2005；蘇國賢 2008）。但由於後工業理論通常被用來分析已開發國家，而台灣通常被歸類為新興工業國家或發展中經濟體，因此我們必須面對分類標準的質疑：在什麼經濟發展與就業結構的條件下，可以大膽使用後工業主義的分析架構？

面對有關經濟發展階段的質疑，我們可以回顧已開發國家與台灣的實質經濟成長軌跡。圖2呈現美國、日本、瑞典與台灣以2000年的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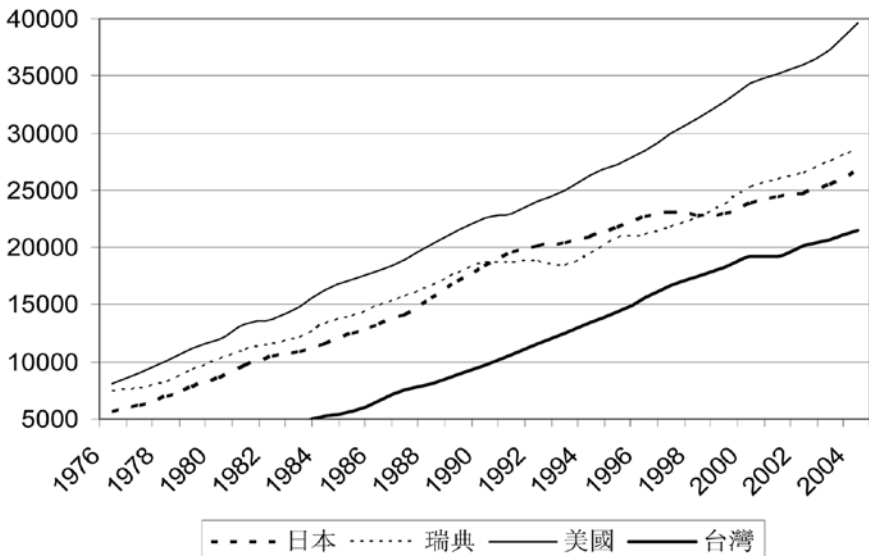


圖2 台灣的實質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以2000年PPP平減）與美國、日本以及瑞典的比較，1976-2004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2006)。

力平價為基準計算的每人每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美國在1976年時，人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達到8,144美元時，Bell已經提出了後工業理論，當時的瑞典與日本人均實質國內人均生產毛額約合7,451與5,614美元。台灣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則在1989年超過了8,000美元，若是以1990年Fred Block的後工業著作出版時美國實質平均國民所得（22,530美元）為界限，台灣在2006年也已經越過了此一標準。以台灣現階段的國民生產與消費能力來看，與歐美各國提出後工業理論時的經濟發展程度十分接近。

從官方的各項就業結構數據來看，宣稱台灣已經邁入後工業社會似乎並無不當。表2呈現了台灣的相關就業統計指標。首先，如Bell（1976）指出的，後工業社會的特徵是服務業就業者比例的絕對優勢與製造業就業者比例的持續下滑。表2的數據顯示，從1981年到2006年之間，台灣的服務業就業者比例從39%上升到近60%，服務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則由47%上升到72%。上述台灣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遷，顯然符合後工業化的特徵。

台灣是否進入後工業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或者說就業者的平均技術水準大幅上升。從台灣的工業勞動生產力指標來看，1992年到2007年之間每人每小時平均產值成長了220%，單位產出的勞動成本則下滑了26%（行政院主計處 2009，參見後文圖7）。此外，大學以上勞動者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5%到2007年超越了20%，包括專科在內的大專畢業比例則高達40%，約與1990年代美國勞動力中高等學歷比例相當，³ 以大專以上文憑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存量

³ 美國的勞動力中大學畢業生比率在1992年為26.4%，2007年為33.7%。參見美國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tables/09s0572.xls>。

快速成長。無論從單位勞動生產力或是勞動力從大學畢業比例來看，在過去二十年內，台灣就業者的相對技術水準還是大幅提升了。

表2 台灣的社會結構轉型、性別分工變遷與貧富差距，1981-2006

相關社會指標 (%)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後工業化/專業化¹						
服務業從業人口佔就業者比率	38.8	41.4	47.1	52.4	56.5	58.5
服務業佔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47.2	47.4	55.2	61.1	66.9	71.7
大學以上佔勞動力比率	5.2	5.8	7.2	9.5	12.5	19.3
階級結構（從業身分）¹						
雇主	4.5	4.3	5.1	5.3	5.2	5.1
自營作業者	20.8	20.2	18.6	17.0	15.8	13.9
無酬家屬工作者	10.4	10.9	9.1	8.4	7.3	6.4
私營受僱者	51.9	52.8	55.7	58.0	61.5	65.3
政府受僱者	12.4	11.9	11.4	11.3	10.2	9.2
性別分工轉型¹						
大學以上勞動力中女性比率	26.3	30.5	34.0	39.2	41.5	45.2
女性勞動參與率	38.8	45.5	44.4	45.8	46.1	48.7
女性工資佔男性比率	64.0	65.2	66.2	71.0	75.8	79.2
社會不平等²						
五分位可支配所得比率（低/高）	23.8	21.7	20.1	18.6	15.6	16.6
中間三等分佔總所得比率	54.2	53.5	53.6	53.9	52.5	53.3
基尼係數	28.2	29.3	30.8	31.7	35.0	33.9

資料來源：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庫：<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L.asp>（行政院主計處 2009）。

2. 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5/a11/Year04.doc>（行政院主計處 2007）。

在產業與技術升級的前提下，台灣的階級結構變遷是否符合後工業理論的預期呢？從主計處與勞委會的勞動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台灣產業結構朝服務業轉型，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在過去二十年裡迅速地減少，私營部門受僱者比例不斷增加。官方統計數據僅將從業身分粗分為五類：（1）雇主：從1981年到2006年間，雇主佔就業者

的比例從就業人口的4.5%緩慢上升到 5.1%；（2）自營作業者（包括農民）：在同一期間，台灣的自營作業者所佔的比例由21%下降到14%以下；（3）無酬家屬勞動者：這個類別佔就業者的比例，自1981年起，由10.4%持續下降到2006年的6.4%；（4）私營受僱者：台灣的私營受僱者佔全體就業者的比例持續上升，由1981年不足52%到 2007年超過了66%；（5）政府受僱者佔所有就業者的比例輕微下滑，從 12.4%減少到 9.2%。

如表2顯示，根據官方數據的分類，過去的二十年裡台灣的勞動力明顯地「無產化」：自僱者（包括農業人口）與非正式的無酬家屬勞動者從超過三成下降到不足兩成，無產者從五成提升到逼近七成；不僅如此，經濟部的工商登記顯示台灣的新設公司佔公司總數的比率，1992年以前往往高達10%，在該年度13.3%的創業歷史高峰之後，持續下滑到2006年的6.2%，創業率腰斬，反之，同時期歇業公司的比率，則由1992年的3.5%上升到近年來平均6%的水準（見圖3），製造業歇業的趨勢更為明顯，過去被當成台灣階級流動途徑的家庭工廠與頭家娘等現象，或是全球理理論家眼中的非正式部門就業比例，有顯著衰退的趨勢（章英華、黃毅志 2007: 3）。⁴

然而，由於受僱者的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官方數據又不能辨別小雇

⁴ 章英華、黃毅志（2007）的論文中首次提到黑手變頭家現象的衰退，惟與本文不同之處是該文所使用的資料為1997與2005年度，重點在於教育對流動之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創業活動衰退，台灣的企業規模並未提升（呂玉瑕 2009），企業平均員工數由1981年的平均8.6人下降到2006年的 6.8人，製造業工廠的平均人數則由24.1人下降到18.6人，近十年來工廠規模雖有止跌回升的現象，但服務業的企業規模遠小於製造業，因此，就業人口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時，仍使企業規模加速萎縮。見主計處歷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數據：<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533&ctNode=543>。



圖3 台灣公司創業趨勢的衰退與歇業趨勢的上升，1992-20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9）。

主、技術工人或經理人在雇主與受僱者當中所佔的比例，我們無法據此判定台灣的階級結構是朝無產化或後工業化發展。為了克服政府勞動統計分類不明確、與官方加總數據缺乏樣本個人層次資訊所導致的問題，筆者用《社會變遷》樣本來估計階級結構的變動。根據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將受訪者歸類後，在1992年到2007年期間，各階級位置的成員佔整體受訪者的比例與其變化詳見表3。

1992年到2007年樣本中各階級位置的比例反映了台灣階級結構的變遷：首先，我們發現資本案與小雇主兩個階級位置的比例微幅下滑，與近十年來勞動統計中的雇主比例的微幅減少一致。其次，非技術工人的比例先微幅上升後緩慢下滑，但變化不顯著。第三，經理人由13.3%下滑到9.5%，但專業經理人由2.4%上升到8.5%。此外，在1992年到2007年

表3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受訪者的階級結構，1992-2007

	1992	1997	2002	2007
非技術工人	46.83	48.86	47.41	47.22
自營作業者	20.61	14.41	11.99	11.18
專家/技術工人	8.87	11.64	17.56	17.12
經理人	13.31	13.78	7.97	9.46
專業經理人	2.36	2.67	8.66	8.52
小雇主	5.78	6.79	4.64	5.08
資本家	2.25	1.84	1.78	1.41
總計(N)	100(1781)	100(2061)	100(1293)	100(1279)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自行整理。

之間，階級結構最大的變化，來自技術工人或專家與自營作業者這兩個階級位置，在比例上的顯著逆轉：技術工人或專家的比例由 8.9% 上升到 17.1%，而自營作業者的比例則由 20.6% 下降到 11.2%，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勞動參與率的下滑，也反映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樣本的就業者數量上。上述階級結構的變化十分吻合官方統計數據改變的趨勢。

從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數據中的階級結構變化來判斷，與全球化理論的看法相左，1992年以來，由於階級結構中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勞動力的比例快速下滑，作為全球化指標的非正式就業比率可能不增反減。其次，與無產化理論裡去技術化的趨勢不同，台灣非技術工人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並未快速擴張、而是趨於穩定，中產階級專業者與技術工人的比例顯著上升，管理人員反而減少。後文統計模型的估計也顯示：在1992年到2007年間自營作業者、經理人、小雇主與資本家等類別的流入比率隨時間顯著減少，1970年代之後出生的世代更少進入自僱者位置，而更容易流入專家與專業經理人等位置（見表4，p121）。因此，台灣的產業與階級結構的變化不支持無產化與全球化理論，而是相對符合後工業理論的預期。

四、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⁵

在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方面，無產化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學校體系基本上再生產了資本主義下的階級關係，這表示流動表中各階級的代際流入與流出的變化將會非常有限（Hout 1980）；後工業理論則認為教育在社會流動中的角色將會持續提升，這不代表整個社會更加開放，而可能是知識份子階級再生產（或者說是文化資本代際積累）所造成的結果（Bourdieu 1984, 1986 [1983];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Szelenyi 1987）。最後，全球化理論對代際階級流動的趨勢並沒有提出清晰的假設，但強調從終身僱用制往非正式受僱者或自僱者、甚至小雇主移轉的代內流動。我們該如何估計並比較近年來台灣階級流動的變化呢？

本文使用可同時處理連續變量與名目變量的多元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或簡稱MNL）模型來估計1992年到2007年間台灣的代際與代內階級起源與終點的關係（Agresti 2002; Hendrickx and Ganzeboom 1998；蔡淑鈴 2004；陳婉琪 2005），應變量是流動終點為其他階級位置相對於無產階級（私營非技術工人）位置的發生比率（odds-ratio）。模型中的正負相關係數顯示受訪者抵達各年度階級位置時，該變量影響其相對於無產階級發生比率的高低。

模型中第一組自變量是影響代際流動的變量，由於問卷內有關父親職業的技術與權威資訊有限，筆者將父親的階級位置簡化為政府單位雇員（包括軍公教與國營事業）、私營企業主或其他（主要是私營工人與農民）三類。為了瞭解父母階級位置對子女階級終點的影響是否隨時間

⁵ 謝雨生教授與張晉芬教授均指出，本文中的MNL模型並未直接測量代際階級流動總量的長期趨勢，而是測量階級起源與終點的關係，因此將本節主題改為「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

而下降，筆者將父親的階級位置與時間的交互影響列入自變量，其中時間指的是四次調查每隔五年作為一個單位的連續變量。其次，父母親的教育年限可能會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Blau and Duncan 1967），本文以此來衡量知識份子階級代際繼承或階級再製的現象。此外，筆者也發現在1970年代之前出生與之後出生的世代之間，某些代際與代內階級終點的概率出現相當顯著的變化。最後，與中國大陸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類似（Bian and Logan 1996; Wu 2002; Xie and Wu 2008），台灣的政府部門受僱者可能擁有較多的組織資產、或者說再分配權力（redistributive power）上的優勢（李碧涵 1996b），因此筆者假設父親受僱於政府部門與外省族群身分將會對子女代的階級流動造成正面影響（吳乃德 1997；陳婉琪 2005）。

MNL模型中的第二組自變量是影響代內流動的個人特徵（individual attributes）或政治經濟特徵等變量，包括性別、教育程度與政治身分等。為了與中國大陸類似研究中的共產黨員政治優勢作類比（林宗弘 2007b），筆者跟隨林南（1997）的研究，以國民黨員的身分來測試政治優勢在階級流動上造成的變化；最後，為了控制1992年到2007年之間的年齡、時期（period）與世代（cohort）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我將受訪者當時的年齡、四次調查的虛擬變量、每五年一個單位的連續變量以及1970年代之前與之後出生世代的虛擬變量都放進模型，以控制年齡、時期與世代（age-period-cohort, APC）的效果。

在影響階級終點的時間趨勢方面，本文大量採用連續的時間變量與世代變量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來計算相關自變量或控制變量的影響趨勢。最後，為求統計模型的簡約（parsimonious），不輕易浪費自由度，依據交互項的統計結果，筆者刪除了所有未達顯著水準的變量，因此，表4裡的所有變量，其迴歸係數至少對六個階級終點的其中一個

具有統計顯著的效果。反過來說，凡是表4上沒有顯示變量與時間或世代交互作用的，就表示在筆者嘗試中，該自變量或控制變量與時間以及世代的交互作用在統計上不顯著，本文將之解釋為該變量不隨時間而有明顯演變。有關模型選擇與其限制、以及相關變量的敘述統計，請詳見附錄說明。

表4報告了MNL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幾項代際流動變化的特徵：首先，在1992到2007年間，父親是私營企業主對子女成為資本家或小雇主的概率有正面顯著的影響、亦有助於子女進入擁有技術與權威的階級位置（其效果隨時間而輕微下降但不顯著）；反之，父親是政府雇員的背景促使後代成為資本家或經理人的機會隨時間顯著提升。其次，父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新中產階級有明顯的正面作用；反之，母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較小，但是對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成為專家與專業經理人的機率有較顯著的正面影響。至於族群對流動的影響方面，原住民身分始終對階級終點造成負面影響；對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世代來說，外省籍會顯著降低成為雇主或經理人的機會，但對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來說，外省籍對成為雇主的負面影響已經大致抵銷，對進入專家或專業經理人的概率影響轉為正向（陳婉琪 2005）。整體來看，與過去新韋伯派的階級流動研究結論類似，台灣代際階級繼承的效果存在但無明顯惡化（吳乃德 1997；蔡瑞明 1997；蘇國賢 2008），近二十年來，父親為雇主（資本擁有者）仍能對子女帶來顯著的社會流動優勢。但另一方面，軍公教或國營事業雇員（組織資產擁有者）、與父母親的教育水準（技術資產擁有者）開始對後代的階級終點產生更大的正面影響（孫清山、黃毅志 1996b）。

在影響代內流動的變量方面：首先，1970年後出生世代相對容易進入專家或技術工人以及經理人位置。其次，在控制父母教育後，個人教

育程度仍然是導致台灣階級流動的重要因素，但是對1970年之後出生的世代來說，教育年限所帶來的階級流動機會正在萎縮。另一方面，與中國大陸城市地區幹部成為資本家的優勢相反（林宗弘 2007b），在台灣2002年的數據中，國民黨員作為一種政治資本，雖然可能有助於受訪者成為經理人或專業經理人，卻不容易成為小雇主或自僱者，而此一政治資本的效果隨時間略有下降，但是國民黨員仍然特別不易成為資本家。

從時間與世代這兩個變量的係數來看，自僱者、經理人、小雇主與資本家的流入比率正在下滑，新世代進入專家或技術工人與專業經理人的機會顯著提升，這些變化與其他代際或代內流動變量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階級流動，不像無產化論者所認為的是個下流社會，也不像全球化理論所說是朝自僱者或小雇主等彈性生產部門流動，而主要是朝後工業化轉型所導致的結果。

最後，圖4比較了台灣階級終點發生率的世代差異，在已經控制年齡、時間與教育程度等相關變量的情況下，仍顯示出1970年前出生者與1970年後出生者在階級流動上的巨大反差。相對於整個樣本的概率，1970年前出生世代流入自僱者、小雇主與資本家位置的發生率遠遠高過後1970後世代，顯示對後者來說「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管道正在消亡，1970後世代則更依賴高等教育與專業技術（孫清山、黃毅志 1996b）。因此，父母的教育成就或軍公教背景（以及外省籍後一世代成為專業者由負向轉為正向效果）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越來越重要。然而，子女本身的教育成就對階級流動的效果卻在降低。這雖然稱不上無產化，但也不符合自由派工業主義者「開放社會」的觀點，反而顯示技術官僚這個新階級的再生產能力在加強，符合後工業理論知識份子邁向權力的預測。

表4 台灣階級流動終點的多元邏輯迴歸估計，1992-2007

代際繼承變量	1992年到2007年的階級終點					
	自僱者	專家	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	小雇主	資本家
父親為雇主	-0.052 (0.210)	0.526* (0.212)	0.444* (0.190)	0.639^ (0.366)	0.711** (0.237)	1.288*** (0.334)
父親為雇主×時間	0.231* (0.106)	-0.227* (0.112)	-0.034 (0.114)	-0.061 (0.171)	0.033 (0.134)	-0.231 (0.222)
父親為政府雇員	-0.169 (0.194)	0.047 (0.193)	-0.036 (0.179)	0.146 (0.308)	-0.258 (0.281)	-0.349 (0.443)
父親為政府雇員×時間	0.068 (0.133)	0.082 (0.113)	0.271* (0.119)	0.253 (0.156)	0.304^ (0.182)	0.718** (0.266)
父親的教育年限	0.011 (0.014)	0.039** (0.015)	0.034* (0.014)	0.081*** (0.020)	0.018 (0.020)	0.012 (0.029)
母親的教育年限	-0.011 (0.021)	-0.015 (0.022)	-0.007 (0.021)	-0.013 (0.028)	0.030 (0.028)	0.044 (0.043)
1970後世代母親教育年限	-0.080** (0.028)	0.123*** (0.026)	0.012 (0.026)	0.069^ (0.038)	-0.096** (0.037)	0.006 (0.055)
外省族群	-0.690** (0.222)	-0.257 (0.207)	-0.536** (0.208)	-0.178 (0.251)	-0.822** (0.308)	-0.493 (0.366)
1970後世代外省族群	0.691* (0.329)	0.461^ (0.269)	0.911*** (0.264)	0.867** (0.335)	0.968* (0.420)	-0.508 (0.820)
原住民	-0.918* (0.427)	-0.607 (0.396)	-1.194* (0.522)	-37.778*** (0.284)	-0.890 (0.607)	-37.682*** (0.294)
代內流動變量						
女性	-1.183** (0.425)	-1.499** (0.489)	-1.946*** (0.493)	-1.342^ (0.770)	-1.030 (0.659)	-3.010* (1.513)
1970後世代女性	0.123 (0.177)	0.525** (0.187)	0.444* (0.189)	0.082 (0.300)	-0.095 (0.265)	0.287 (0.618)
教育年限	-0.028^ (0.015)	0.303*** (0.029)	0.280*** (0.022)	0.396*** (0.050)	0.124*** (0.025)	0.255*** (0.045)
1970後世代教育年限	0.034 (0.020)	-0.254*** (0.031)	-0.179*** (0.027)	-0.273*** (0.052)	-0.068* (0.033)	-0.136* (0.059)
大學文憑	-0.562^ (0.290)	1.060*** (0.161)	0.136 (0.168)	0.510* (0.225)	0.392 (0.245)	0.104 (0.336)
國民黨員	-0.830*** (0.176)	0.149 (0.179)	-0.080 (0.155)	0.717** (0.277)	-1.066*** (0.257)	-0.393 (0.366)
國民黨員×時間	0.397** (0.122)	0.052 (0.133)	0.259* (0.125)	-0.006 (0.167)	0.418* (0.170)	-0.826^ (0.474)
APC變量						
年齡	0.028*** (0.006)	0.032*** (0.008)	0.021** (0.007)	0.030** (0.011)	0.024* (0.010)	0.023 (0.016)
1970年後世代	-0.333 (0.265)	2.456*** (0.404)	1.801*** (0.357)	2.958*** (0.726)	0.865* (0.427)	0.786 (0.782)
時間（連續變量）	-0.334*** (0.066)	0.008 (0.081)	-0.345*** (0.087)	0.312* (0.135)	-0.333*** (0.099)	-0.423* (0.186)
1997年虛擬變量	-0.178^ (0.095)	0.218* (0.110)	0.110 (0.104)	-0.155 (0.201)	0.184 (0.133)	0.107 (0.241)
2002年虛擬變量	-0.159 (0.144)	0.646*** (0.130)	0.202 (0.159)	1.098*** (0.173)	0.211 (0.199)	0.712* (0.327)
常數項	-0.413 (0.792)	-11.527*** (1.247)	-8.373*** (1.073)	-15.301*** (2.189)	-5.339*** (1.308)	-7.512*** (2.252)
Log likelihood = -8105.7061 N = 6045	Df = 132		Wald-G ² = 33307.46	Pseudo-R ² = 0.130		

註：1. 括弧內為標準誤。所有模型裡階級變量的參照組是「非技術工人」。

2. “*” p<0.05, “**” p<0.01, “***” p<0.001, “^” p<0.1（雙尾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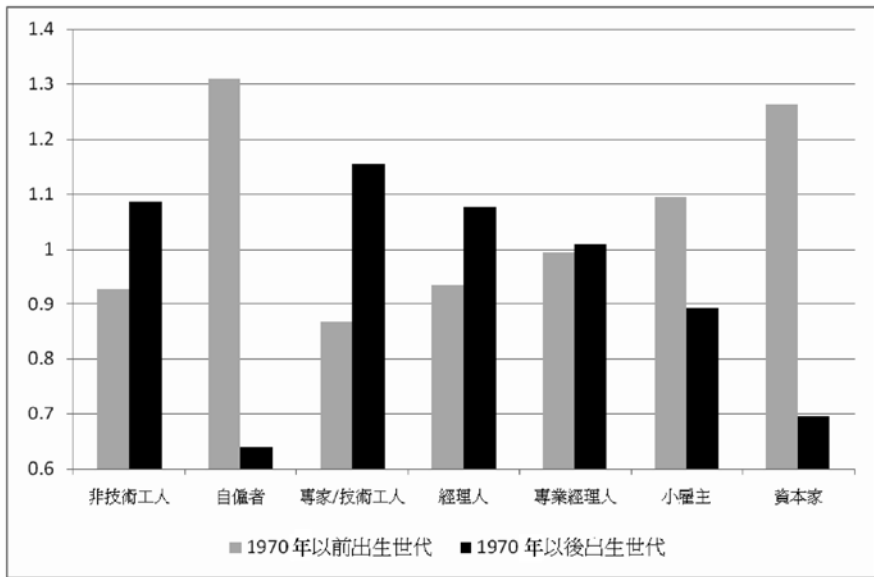


圖4 台灣階級流動終點發生率的世代差異：1970後世代黑手變頭家逐漸消失

五、階級結構與性別分工的轉變

在勞動市場的性別分工方面，無產化理論強調女性落入低技術與低薪工人階級的階級流動障礙與性別的工資歧視，台灣與東亞經濟起飛是以女工的犧牲為代價（黃富三 1977；呂玉瑕 1994；嚴祥鸞 1996），過去台灣社會學研究則發現了父權體制犧牲長女學業、要求女性提早進入勞動市場，從而成就弟妹的教育歧視行為（Chu, Xie and Yu 2007）。但後工業理論指出：隨著製造業的外移與服務業的興起，以及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受僱者有更多機會進入中產專業階級，婦女的職業生涯及收入的獨立自主將衝擊傳統父權下的兩性關係，連帶造成婚姻、生育

行爲與老年照護體系的整體變遷（Gorz 1994; Giddens 1999；呂玉瑕、伊慶春 2005；蔡淑鈴 2004）。最後，全球化理論強調女性持續進入非正式部門成爲自僱者或無酬家屬勞動者，將導致兩性工資差異惡化的後果（Hite and Viterna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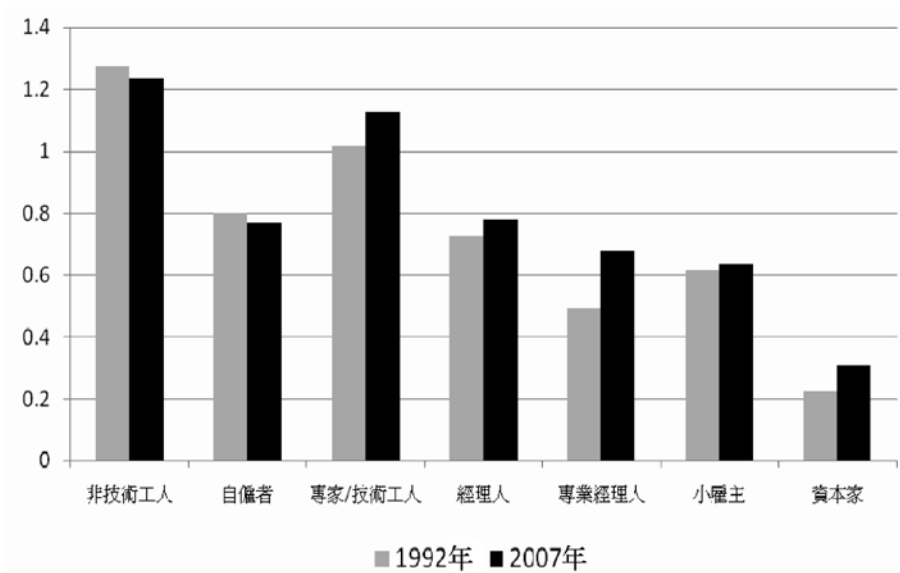
在表2的政府統計數據中，有三個值得留意的趨勢，顯示後工業理論更能解釋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分工的變化。首先，是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顯著成長，由1981年的 39%增加爲 2006年的 49%。雖然與先進工業國家相比，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屬偏低，但其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沒有改變。其次，大學以上勞動力擴張到 20%的同時，其中的女性比例也由 1981年的26%成長到 2006年的 45%，顯示台灣父權家庭過去對女性、特別是歧視長女的教育投資行爲，可能因爲平均家庭子女數的下降而逐漸獲得改善。最後，上述的各因素：勞動參與率提高與教育程度提高，可能導致了女性相對工資比例提升，由1981年佔男性平均工資的 64%逐漸增加到 79%以上。然而，總體層次數據的分析很可能造成所謂的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因此不宜過度推論。

近年來台灣性別不平等的量化研究成果顯示，後工業理論可能較符合過去二十年來的父權體制變遷。例如蔡淑鈴（2004）的研究發現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可能已經促進了兩性教育流動機會的均等化，在控制其它變量的情況下，1970年代後出生的女性上高中與大學的概率已經高於男性（Tsai and Shavit 2007）；而呂玉瑕及伊慶春（2005）的研究發現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由於後工業化的衝擊與女權運動的興起，台灣家庭中兩性的經社資源變遷已經影響了家務分工。喻維欣最近對日本與台灣女性在勞動市場表現的比較研究發現，同樣朝後工業社會轉型，同樣面臨女性生育後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障礙，台灣婦女的勞動參與遠比日本婦女更加「正式化」而非彈性化，間接降低了兩性工資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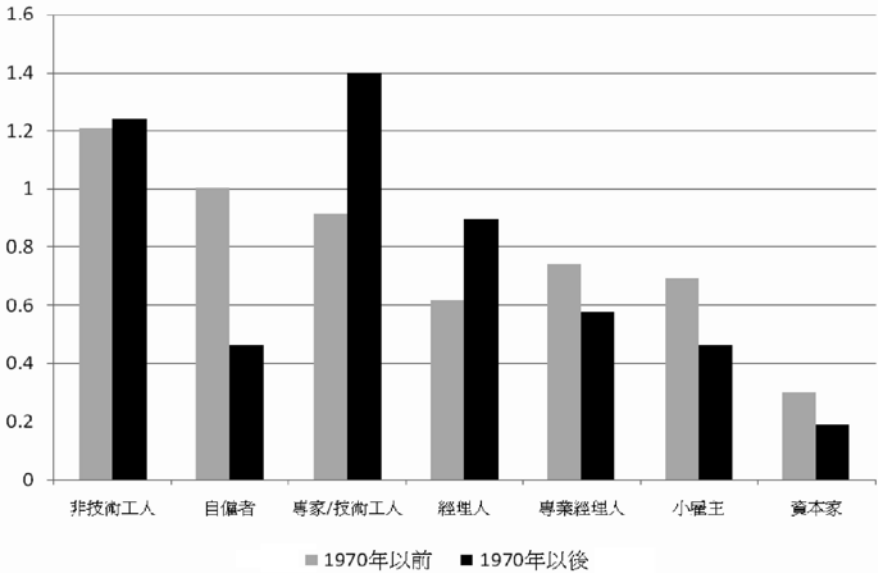
(Yu 2009: 139)，張晉芬等人對台日韓三國的比較也得到類似的結論 (Chang and England 2009)。

雖然衡量經社地位的指標不同，本文新馬克思主義模型對1992到2007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數據階級流動的分析，支持了上述結論。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後，筆者根據表4模型計算了1992年度與2007年度女性在各階級終點的發生比率（相對於整個樣本），以及女性在1970年前出生與1970年後出生的兩個世代，進入各階級位置的發生比率（odds-ratio），並且將結果呈現於圖5，換句話說，圖5A與5B中的柱狀圖高低，顯示的是女性進入該階級位置的機率除以兩性進入該階級位置的機率，大於一則表示女性的概率高於樣本平均，自然也高於男性。

從圖5A我們可以發現三組不同的趨勢。首先，女性進入無產階級位置的機率一向高過男性，但是在1992年到2007年之間，女性勞動者進入



5A 1992年與2007年女性進入各階級的發生比率



5B 1970前與1970後世代女性進入各階級的發生比率

圖5 MNL模型估計階級終點依性別分的發生比率(Odds-ratio)

無產階級與自僱者位置的發生比率些微下滑。其次，女性就業者進入經理人與小僱主的發生比率些微上升。第三，女性進入專家與技術工人、專業經理人與資本家等三個階級位置的發生比率有顯著的提高，其中女性成為專家或技術工人的機率甚至高於男性。圖5B比較了1970年前後出生女性的世代差異，發現儘管年輕女性（與年輕男性類似）較少機會進入資本家與專業經理人等位置，但1970年後的女性更少成為自僱者或無酬家屬勞動者，成為專家或經理人的發生比率則有明顯的提升。

儘管從表4的迴歸結果來看，女性獲得資本或權威位置的機率仍明顯偏低，但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對女性教育歧視的減弱，與女性流入專家或技術工人位置的現象，或許是男女工資比率逐漸拉近的重要原因之一（蘇國賢 2008: 213）。台灣女性雖然仍相對集中在無產階級位

置，但是並未像全球化理論所言大量落入非正式部門成為彈性化的勞動者，反之，後工業化的趨勢可能已經改變了各階級位置的性別比例分布，從而間接縮減了兩性的工資比率差異。後工業轉型不僅影響男女工資比率，更可能會大幅改變兩性的家務分工、生育與老年照護行為。

六、資本、技術與貧富差距

最後，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台灣公眾關注的重要問題。在後工業社會，例如《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2/3*）對歐盟各國個人所得的研究顯示，相對於其他階級分類法，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模型更能解釋歐洲民衆的貧富差距，而且階級不平等具有相當強的持續性（Leiufrud, Bison and Jensberg 2005）。對亞洲四小龍的量化分析則發現台灣的吉尼係數主要受到服務業所佔的比例、失業率與民主化影響：失業率與後工業化顯著提高了吉尼係數，民主化之後的福利國家擴張則對於吉尼係數的增長產生抑制作用（林宗弘 2007a）。然而此一跨國數據的結論，無法用以推論階級結構變遷與貧富差距擴大的關係。

表2呈現了衡量台灣社會整體所得不平等的幾組數據：首先，台灣的吉尼係數由1981年的0.282 逐漸提高到 2001年的 0.350，然後些微回落到 2006年的 0.339。若將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中的最貧與最富五分位家庭所得總額相除，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最貧窮的20%家庭佔最富 20%家庭的收入比率，與吉尼係數的變化高度相關：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所得佔高收入家庭平均所得的比率，由23.8%下滑到 2001年的15.6%，然後輕微回升到 16.6%。然而另外一個指標卻呈現出不同的趨勢：扣除前述的高與低兩階層，中間60%收入家庭所佔的總所得比例，在1981年為 54.2%，到2006年則仍有 53.3%，過去二十多年來這個比率僅輕微

浮動。測量不平等的總體數據，其變化符合蔡明璋（2006）與蘇國賢（2008）的觀點：與無產化理論或M型社會的觀點相左，台灣的貧富差距主要不是來自中產階級整體收入的下滑，而是來自高低兩端家庭所得分配的惡化（蘇國賢 2008）。

表5 台灣就業者平均年度基本所得按職業別分（2008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1980		2006		基本所得增加倍數
	金額（元）	人數分配（%）	金額（元）	人數分配（%）	
全體就業者	127,531	100.00	530,497	100.00	3.16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278,074	3.42	1,173,468	4.95	3.22
專業人員	202,367	7.17	910,489	7.88	3.5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0,468	16.11	643,741	19.09	3.28
事務工作人員	160,203	10.50	437,238	12.34	1.7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18,949	5.95	440,649	18.17	2.70
技術工及體力工	110,054	37.61	406,388	32.10	2.69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2,748	19.24	243,651	5.47	2.35

資料來源：<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7/a11/Year27.doc>。

2008年度的家庭收支調查提供了職業類別人數比例與個人基本所得，在1980年與2008年之間的變化，結果見表5。這個數據顯示：在職業分類方面，家庭收支調查結果與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抽樣結果相當，顯示藍領工人與自營作業者、尤其是農部門就業人口的萎縮、與服務業人員以及專業技術人員比例的膨脹。在基本所得成長方面，台灣全體就業者的名目所得，在1980年到2006年間平均提升了3.16倍，然而收入較低的四個階層：農林漁牧工作者、技術工與體力工、服務業的工作人員與事務工作人員的所得，其成長倍率低於平均，而且製造業與服務業非技術工人（服務工作與事務工作人員）的所得差異十分有限，

也就是說，非技術工人由製造業朝服務業移轉無助於提高他們的所得。反之，技術工人與專業人員的所得成長倍率則高於平均，顯示台灣所得差異的擴大，可能同時來自資本與技術資產擁有者的經濟優勢（蘇國賢 2008）。

與前述分析類似，對總體數據的解讀可能導致區位謬誤，因此筆者用1992到2007年的合併數據來分析個人階級位置與貧富差距的關係。表6中回報了以2005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準平減之後，受訪者實質每月平均所得對數的加權多元迴歸（Weighted Least Square, WLS）結果，最重要的自變量是受訪者的階級位置，以及階級位置與時間（連續變量）的交互作用。其次，筆者多次嘗試後控制了政府單位與國民黨員（虛擬變量，可與中國大陸國有單位及共產黨員的政治資本相對照）可能獲得的政治經濟優勢、以及是否加入工會或社團（可以衡量社會資本的效果）、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教育年限與大學文憑。最後，模型中加入了衡量父親階級位置與族群身分的變量，以探討代際移轉是否影響受訪者所得。此外筆者發現其中有部分自變量的效果，例如教育年限、公家機關及社團參與，跟1970年代之前或之後出生兩個世代的虛擬變量有強烈的交互作用。在控制模型裡的變量之後，各階級之間的相對收入變化（以自僱者=1為準）繪於圖6。

《社會變遷》1992年到2007年的迴歸估計與家庭收支調查的加總結果大致相同。首先，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後，我們可以估算各階級位置的月平均所得與淨差異，結果顯示受訪者每月所得差別始終顯著，其中

- （1）資本家的實質所得與相對收入成長優勢最明顯（從60,989元提升到82,740元）；
- （2）專家／技術工人的實質工資與相對收入持續上升（從39,635元提高到42,352元），隨時間增加的係數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 （3）專業經理人與經理人的實質所得與相對收入略為下降，但模型裡

表6 各階級位置對實質所得對數的加權多元迴歸 (WLS) 結果，1992-2007

	迴歸係數	標準誤
階級位置		
自僱者	0.012	(0.041)
專家/技術工人	0.154***	(0.034)
經理人	0.325***	(0.032)
專業經理人	0.403***	(0.046)
小雇主	0.485***	(0.061)
資本家	0.692***	(0.085)
階級位置 × 時間 (連續變量)		
自僱者	-0.084**	(0.028)
專家 / 技術工人	0.048*	(0.019)
經理人	-0.024	(0.024)
專業經理人	0.033	(0.023)
小雇主	-0.007	(0.040)
資本家	0.103+	(0.054)
教育成就		
教育年限	0.057***	(0.004)
1970後世代 × 教育年限	-0.038***	(0.004)
大學文憑	0.106***	(0.028)
政治 / 社會資本		
公家機關	0.207***	(0.025)
1970後世代 × 公家機關	-0.105**	(0.040)
國民黨員	0.023	(0.022)
社團參與 (工會/商會/社團)	0.001	(0.026)
1970後世代 × 社團參與	0.090*	(0.039)
女性	-0.201***	(0.024)
已婚	-0.023	(0.028)
已婚 × 女性	-0.112***	(0.032)
族群差異		
外省族群	0.048*	(0.024)
原住民族群	-0.239**	(0.088)
階級出身		
父親為雇主	0.046*	(0.022)
父親為政府雇員	0.071***	(0.020)
APC變量		
年齡	0.060***	(0.006)
年齡 ²	-0.001***	(0.000)
1970後出生世代	0.409***	(0.059)
時間 (連續變量)	-0.014	(0.016)
1997年虛擬變量	0.162***	(0.020)
2002年虛擬變量	0.166***	(0.033)
常數項	8.441***	(0.144)
R ²	0.375	
N	5467	

註：1.括弧內為標準誤。所有模型裡階級變量的參照組是「私營非技術工人」。

2. “*” p<0.05, “**” p<0.01, “***” p<0.001, “+” p<0.1 (雙尾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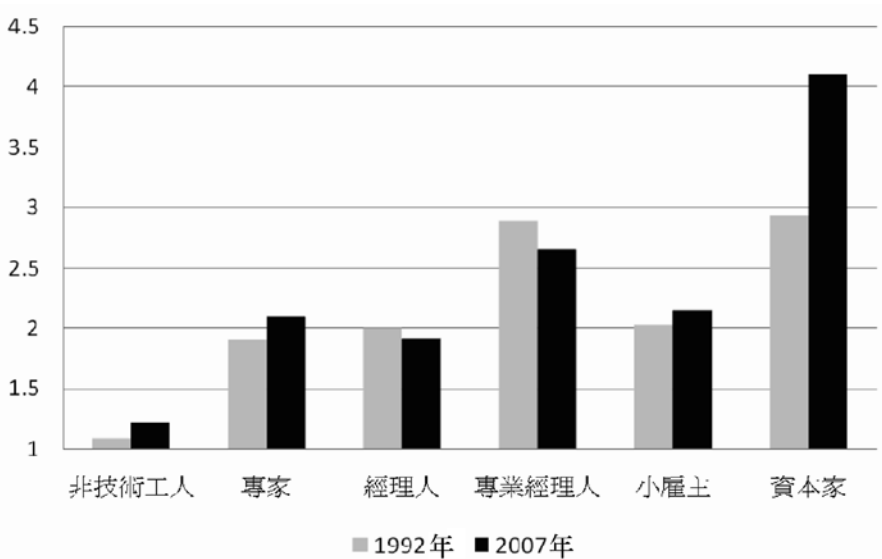


圖6 各階級受訪者的相對所得：1992年與2007年的比較，自僱者 = 1

的時間變化統計上不顯著：（4）自僱者實質所得與相對收入持續下滑（從20,848元下降到20,196元），而非技術工人的實質工資略有上升（從22,850元微升到24,636元），但兩者所得水準始終類似，構成了台灣社會的底層。與近期《歐洲社會調查》所得到的結論相似，在1992年到2007年間，台灣階級差距惡化的源頭主要仍來自資本收益，而技術也開始成為所得不平等的來源之一。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政治優勢對所得的幫助方面，教育年限對個人所得的影響似乎隨著整體教育程度提升與大學教育擴張而縮減，尤其是1970年代以後出生者，其教育年限對所得的影響大幅下滑，但大學文憑仍然有提高所得的定額作用。有趣的是，一如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發現的，政府部門或國有單位有再分配權力的優勢，即使在資本主義持續擴張的情況下也能夠維繫（Wu 2002; Xie and Wu 2008），台灣的政府部門

受僱者並不例外。然而，對1970年代以後出生、解嚴後進入公部門的世代，單位優勢已經大幅衰退。兩岸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共產黨員仍能維持所得與階級流動優勢（Bian and Logan 1996；林宗弘 2007b），但如林南（1997）所發現的，自1980年代以來，國民黨威權體制在政治民主化的衝擊下，已經無法直接給基層黨員帶來明顯的物質利益。

與總體數據的工資性別比略有不同，表5的迴歸結果顯示在控制教育與階級位置等變量後，過去二十年來兩性實質所得金額上的差異，其實沒有太大的改善，只是隨著整體平均工資逐漸提升，此一工資差額佔總工資的比率快速下降。從上述幾個模型的結果來看，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女性可能藉由教育擴張而更容易進入技術與專業職位，而且隨著黑手頭家減少的趨勢，越來越少婦女選擇成為無酬家屬工作者，兩個趨勢合力導致了加總數據裡兩性工資比率差異的縮減，但技術與專業職位的實質所得，卻可能因為兩性工資差額的持續、與女性大量進入此一階級位置而下滑，結果在控制階級位置後，性別工資歧視的金額並沒有隨時間減少。此外，婚姻對女性的實質工資始終造成負面影響，未隨時間而降低，對男性卻沒有顯著作用。

至於兩代之間所得優勢的持續或家戶內所得移轉方面，在1992年到2007年之間，父親的階級、族群身分對子女所得的正負影響，並未隨時間而有太大改變。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父親為政府雇員與資本案仍有助於子女獲得高所得，而且外省族群的優勢與原住民身分的劣勢，對子女所得的影響仍舊顯著。簡而言之，經濟、政治或技術資產的代際繼承（可能部分反映在族群身分上）以及兩代之間所得移轉的能力，對個人層次數據中貧富差距的影響沒有衰退。

最後，在統計模型的預測值上，台灣受薪者的平均實質所得沒有太大的成長，在1997年之後甚至出現了倒退。從總體經濟指標來看，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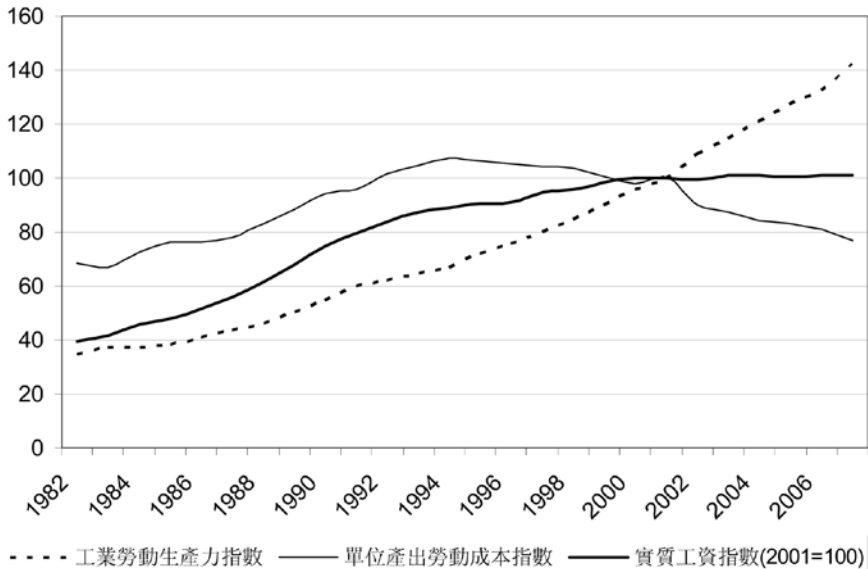


圖7 台灣勞工平均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與實質工資的停滯，1982-20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9）。

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快速提升與工資成長的遲緩，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落差。圖7呈現了以2001年為基準，從1982年到2007年間台灣勞工的工業勞動生產力、工資佔產出成本比例的指數與實質工資指數。從圖7可以發現，台灣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實質工資僅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之間同步上升，此後生產力持續快速提升，勞動成本佔單位產出比率下降，實質工資卻長期停滯不前。

與美國1980年代末期或歐洲1990年代初期的經驗類似（Block 1990; Esping-Andersen 1999），在台灣的階級結構朝後工業社會轉型時，就業者整體技術提升或專業技術工人的成長（以黑手頭家的消失為代價），與實質工資停滯同時發生。但是為何台灣受僱者的實質工資會被勞動生產力的成長遠遠甩在後頭？在迴歸模型中我們發現參與工會或社團對於

個人所得增加，有相當顯著的影響，然而台灣專業技術人員與服務業的工會或行會的組織率卻偏低，集體協商能力有限，可能是後工業轉型下技術工人工資停滯不前的因素之一。此外，製造業的外移與壓低基本工資可能是台灣整體實質工資停滯的重要原因（蘇國賢 2008: 194-195）。

七、結論與討論

台灣社會朝後工業化轉向並不是一個新觀點，許多優秀的研究已經在福利國家與性別研究方面旁敲側擊，指出某些變化的軌跡，卻未能直接從階級結構、階級流動與貧富差距方面直接描繪這一次轉型。本文分辨了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在社會變遷的動力、階級結構的轉型、階級流動的趨勢、性別分工的轉變、貧富差距的重塑等方面的對立命題，並且以台灣的相關數據測試之。

本文的經驗發現可以得出下列四個結論：首先，在階級結構方面，台灣社會中的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無產化進程逐漸停滯，技術工人與專業者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上升。其次，在階級流動方面，「黑手變頭家」式的社會流動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一方面，資本家子女的階級流動優勢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教育成就的代際繼承或者說知識份子階級自我複製的影響，也正在逐漸增強。⁶ 第三，隨著女性教

⁶ 由於缺乏衡量個人生產力的指標，本文的統計模型並未正面處理教育社會學裡有關階級再製（Bowles and Gintis 1975）、人力資本（Becker 1964）與文憑主義（Collins 1979）的相關爭論。如本文評審之一所言，在階級再製、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Bourdieu 1984）這三個概念之間，對教育與生產力的關係可能有相當不同的預設，也可能因時空不同而出現變化，在台灣的量化研究裡，謝雨生與黃美玲（2004）曾發現1997年以前的工農階級以及女性教育成就明顯偏低，比較符合階級再製理論，Liu and Sakamoto（2002）則發現教育仍能有效提高台灣受雇者的個人生

育程度的提升，女性在專業者與技術工人所佔比率上升，間接減少了兩性工資比率的不平等，也可能逐漸影響家務分工、生育及老年照護行爲。第四，台灣的貧富差距主要來自資本與技術的佔有與否。資本家的經濟優勢在過去十餘年中仍然持續擴大，是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但技術工人的實質工資也有顯著提升。總之，台灣各方面的經驗證據更貼近後工業理論的分析。

雖然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社會轉型，顯然仍帶有無產化的特徵，資本主義的階級對立也從未消逝，但是在產業轉型與受僱者技術升級的結構性動力之下，後工業化的軌跡似乎漸成主流。如導論所言，筆者並不認爲後工業化是發達工業社會必然面對的趨勢，也不代表全球化與無產化不會捲土重來，倒不如說，近年來台灣社會中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變遷，可能是兩種不同的生產性資產—資本與技術（或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階級）之間利益妥協的歷史性後果之一。

台灣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變化可能影響階級意識與階級政治的發展。在上述的三派分析裡，無產化將導致階級形成與勞資之間階級鬥爭加劇（Lukács 1971; Thompson 1963），全球化將導致傳統工會組織與福利國家的式微，而後工業化下的階級政治分析則留下了重要的爭論。一方面，某些研究者宣稱後工業化已經導致階級政治的大幅衰退（Lipset 1981），另一方面，許多證據顯示各階級位置的意識型態分歧未曾減弱（Wright 1997），而階級政治始終左右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的選民投票行爲（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5; Chan and Goldthorpe 2007），後工業社會的階級政治變遷方向仍未有定論。

產力，顯示教育擴張對台灣整體教育程度與生產力提升有幫助，符合人力資本或後工業化產業升級的假設，另一方面，本文也建議知識份子階級的自我再製能力在強化，兩者並不衝突。

過去台灣的階級意識與工會研究反覆顯示，台灣勞工的工會組織與階級意識相當薄弱（張晉芬 1992；許嘉猷等 1994；黃毅志 1999）。然而，台灣の後工業化，是否已經改變了選民的主觀階級認知與投票行爲？若將1992年與2007年《社會變遷》裡的階級意識答案分爲「中上／上層階級」、「中層階級」與「中下／下層／勞工階級」三大類，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就業者的自我認同大幅轉向中下階級，主觀中層階級從39.71%下降到31.63%，主觀中下／下層加上勞工階級從49.64%上升到63.98%，階級認知是個「下流社會」，然而，由於受僱者自認爲是藍領「勞工階級」的比例大幅衰退，若將「中上／中層／中下」三組合併爲廣義的中產階級，則自認爲中產階級的比例反而上升了。顯然，問卷的主觀階級分類影響了研究者對台灣民衆階級意識變化的解釋，但是從後工業理論來看，受訪者以「中下／下層階級」取代「勞工階級」的認同趨勢並不矛盾。

最近台灣的社會階層化研究也發現了階級政治的復興。例如蔡明璋等人的研究顯示，台灣不同階級民衆對福利與稅收的意見仍有很顯著的分歧（Tsai et al. 2008）。此外，胡克威、林宗弘與黃善國對投票行爲的研究發現，1992年以來族群投票的效應並未提高，但是在1998年之後，階級投票有顯著的上升趨勢（Hu, Lin and Wong 2009），控制者階級（包括資本家與專業者）與體力工人的藍綠分化傾向日益顯著。民主化、後工業化與兩岸經貿開放的衝擊，很可能已經改變了台灣民衆的主觀階級意識與階級投票行爲，其效果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索。

從本文的結論來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台灣與南韓等已經逐漸步上已開發國家的後塵，必須面對資本外移與失業問題、專業者與非技術工人之間貧富差距擴大、傳統父權家庭的衰微、生育率下滑、人口老化與家戶消費停滯導致經濟成長趨緩、勞動參與率萎縮導致社會保險收支

失衡、國家財政惡化與開放移民等後工業議題。我們勢必被迫在更短時間內治理後工業轉型所導致的政治與社會衝擊。

最後，對台灣社會變遷的分析，將導致公共政策辯論上的重要差異。主張無產化理論者可能會著重工人相關福利擴張或階級鬥爭的重要性，而主張全球化理論者可能會著重全球工會與社運串聯、或者從國內政治出發反對國家管制的撤退、甚至是反移民政策或者貿易保護主義，後工業理論與上述觀點或許不完全衝突，但是社會政策的優先順序會出現歧異，例如更加關注服務業或高科技業的工會或社團組織如何擴張、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如何達成、性別分工轉型下的生育與老年照護政策如何推行，以及產業轉型的政策如何調整等等，對社會變遷的判斷將影響我們對「後工業機會」的理解與社會運動所採取的戰略（Block 1990）。

作者簡介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研究興趣為社會階層化、比較政治經濟學、量化研究方法、中國研究與災難社會學，已發表的相關期刊論文請參考個人網頁：<http://www.ios.sinica.edu.tw/fellow/thunghonglin/>，目前從事的是兩岸三地階級結構與貧富差距的比較研究、亞洲的政治轉型與貧富差距的跨國數據研究、台灣與四川地震的災後重建與公民社會比較研究，以及反事實推論與分類數據模型的應用。

附錄

在附錄中，筆者將說明本文相關的統計分類法、敘述統計與統計模型選擇的問題。首先，本文採用了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在具體的操作層次上所依據的《社會變遷》問卷相關問題如下：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第一個判準是生產工具，具體是為自己或為他人（雇主）工作，為自己工作者又根據有沒有僱人以及僱用多少人分為三類，首先，未僱人者就列為自營作業者，僱用1-7人列為小雇主，僱用人數在8人以上者列入資本家類。過去的相關研究也有將小雇主的界線推到僱用10人左右，從數據本身來看，兩者的差異其實非常輕微。

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的第二道判準是管理權，本文對高低權威的分類是依據下列幾個問題：在受人僱用的就業者當中，是否管理別人回答「是」者則列入有權威、管理人數在八人以上以及被管理者還管理別人的列為高權威。此外，筆者參考了《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提供的台灣地區職位分類，雖然此一職位分類曾歷經三次調整，卻不影響其中的三個主要大類：行政管理人員（1992年編碼為200-229，1997年起為100-149）與監督及佐理人員（1997年起為150-199）、以及專門技術人員（1992年編碼為8-199，1997年起為200-399）。因此，行政管理與監督佐理人員（包括軍官）兩大類也成為是否有管理權的標準之一。

在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當中最為棘手的是技術層次的測量。從1992年開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對新馬克思主義模型的理解與問題設計，著重於勞動過程的自主性而非某種技術證照的所有權，這使得以剝削性資產為基準的分類方式比較難以適用於台灣的數據，雖然在後續調查裡增補了一些技術證照的相關指標，卻往往無法回溯調整1992年的數據，因此，本文只能折衷採用台灣地區職位分類的專門技術人員

做為經驗上的近似測量指標（proxy），將有技術但沒管理他人的受僱者劃歸專家 / 技術工人一類，並且將是專業技術人員也管理他人的受僱者劃歸專業經理人一類。從後來統計模型的顯著結果來看，這個指標在顯示專業經理人與技術人員所得的優勢以及其持續上升的趨勢方面，經驗上還是相當有效。

本文分類方式在各年度的具體操作變量請參考附圖1，各年度問卷題目選項與職位分類都是完全對稱的。理論上，依據管理權威與技術層次的高低，這個七大階級分類可以變更為12類，從數據上看與新韋伯派分類法的差異也有限，但在實際操作上，管理權威的高低可以輕鬆依據所管理者是否還管理別人（或者是否管理八人以上）來區分，但是在受僱者的技術層次上，《社會變遷》問卷無法提供完全對稱的高低技術判斷，而且越早的調查在分類上就越困難。

本文所面對的另一個分類問題是父親的階級位置。《社會變遷》對父親的職位類別欠缺清楚的分類，更沒有追問父親作為雇主或管理者的

與生產工具的關係		權威關係▼
所有者	受僱者	
資本家 1992: b12>7 1997: v38a_2>7 2002: v48a1>7 2007: d15=1+d24>7	專業經理人 1992: b8=8-199+g9=1 1997: v39_2=200-399+v45>=1, v39_2=11-12 2002: v49b1=200-399+v56>=1, v49b1=61 2007: d16b3=200-399+d23>=1 d16b3=11-12	經理人與領班 1992: b8=200-229+g10>=1 1997: v39_2=13, 100-199, v45>=1, v39_2=13 2002: v49b1=100-199, v56>=1, v49b1=62 2007: d16b3=100-199, d23>=1
小雇主 1992: b11=2 1997: v38a_1=2 2002: v48a=2 2007: d15=1+d24<8		低權威
自營作業者 1992: b9=1, b8=2 1997: v38a_1=1 2002: v48a=1 2007: d15=1, d20=1	專家 / 技術工人 1992: b8=200-229 1997: v39_2=200-399 2002: v49b1=200-399 2007: d16b3=200-399	無權威
與稀有技術的關係▶	專業	技術 無技術

附圖1 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法在1992、1997、2002、2007年調查的操作變量

管理人數，所以無法形成上述的七類。結果筆者只能依據父親的雇主身分與工作單位的性質（公家或私人）將之分為雇主、政府雇員與工農階級三類。本文根據上述父親與子女階級分類所得到的敘述統計結果與簡單相關係數，請見附表1與附表2。

上述分類議題直接與統計模型的選擇相關。首先，從理論上看，代際流動議題是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主要弱點之一，在Wright（1985, 1997）的原著中雖然談到階級的不可滲透性（impermeability），暗示兩代之間的階級流動可以運用不同的矩陣設計來計算之，但是他未曾討論或分析過美國或其他國家代際階級流動的長期趨勢。其次，處理台灣數據的困難之處來自《社會變遷》問卷對父母職業之技術與管理權威層次的忽略，也就不能提供父輩與子女相同的分類方式，無法構成七乘七的兩代階級位置頻率分布方陣。

方陣是Log-linear模型分析的基礎。一般的階級流動研究都必須仰賴方陣來計算流出與流入比率，以及特定的流動障礙與其歷史趨勢等等。然而，在暫時無法解決父輩階級分類的難題之下，筆者只能退而採用MNL迴歸模型。MNL迴歸模型的優勢在於不需仰賴方陣，只要應變量是分類變量即可。在階級終點的時間趨勢方面，本文大量採用自變量 × 連續的時間變量或世代變量之交互作用（interactions）來計算相關的趨勢。然而如幾位評論人所言，將此一統計結果稱為「階級流動」並不適宜，模型裡真正計算出的是各自變量對階級終點發生比率的影響程度。

在筆者選擇模型的過程中，曾經嘗試過各種時間或世代變量與其他變量的交互作用。例如，父親是私營企業主對子女成為資本家、小雇主或新中產階級位置有幫助，然而其交互變量（父親雇主 × 時間）顯示其效果隨時間而輕微下降；其次，父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專家或資本家階級有明顯的正面作用，其交互變量效果（父親教育 × 時間）不隨

時間或世代衰退；反之，母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較小，但是對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成為專家與專業經理人的機率有較顯著的幫助，但是與時間的交互項（母親教育 × 時間）沒有太大的效果。至於族群對流動的影響方面，原住民身分始終對階級終點造成負面影響，其效果（原住民 × 時間 / 世代）未隨時間或世代而下降。此外，或許由於與教育年限等變量高度線性相關，大學文憑在階級流動上的效果（大學文憑 × 時間）未隨時間而顯著降低。最後，為求統計模型的簡約（parsimonious），筆者最後刪除了所有未達顯著水準的變量，凡沒有顯示變量與時間或世代交互項，就表示其交互作用不顯著。

另一個值得詳細說明的是表5的WLS模型。首先，由於1997年以前的《社會變遷》數據沒有權數，該模型計算過程中僅有2002年及2007年的樣本經過加權。其次，在模型選擇過程中，筆者再次嘗試了各種時間或世代變量與其他變量的交互作用，依據簡約原則刪除了大多數統計結果不顯著的變量。第三，由於應變量按照2005年的物價指數平減，結果是1992年與1997年的購買力大幅提高，而且與總體數據裡實質工資略減類似，2007年的實質平均所得比2002年還低。

最後，筆者深信量化研究數據須經過反覆、詳盡的檢驗，且本文結論仍有值得推敲之處，1992-2007年的彙總數據將在筆者的個人網頁上公佈，供其他研究者檢查或教學使用，有興趣下載者請來信與作者聯繫。

附表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2、1997、2002、2007年匯總數據的敘述統計

變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階級位置					
非技術工人	6045	47.15	0.499	0	1
自僱者	6045	15.58	0.363	0	1
專家 / 技術工人	6045	12.34	0.329	0	1
經理人	6045	11.93	0.324	0	1
專業經理人	6045	4.95	0.217	0	1
小雇主	6045	6.09	0.239	0	1
資本家	6045	1.97	0.139	0	1
非就業者	2960	--	--	--	--
女性	9005	0.515	0.500	0	1
已婚	9005	0.571	0.495	0	1
教育年限	9005	9.187	4.975	0	21
大學文憑	9005	0.106	0.308	0	1
國民黨員	9005	0.124	0.329	0	1
政府單位	9005	0.092	0.288	0	1
社團參與	9005	0.197	0.398	0	1
父母特徵					
父親教育年限	9005	5.388	4.447	0	21
母親教育年限	9005	3.606	3.898	0	18
父親為雇主	9005	0.204	0.403	0	1
父親為政府雇員	9005	0.149	0.356	0	1
原住民	9005	0.013	0.113	0	1
外省族群	9005	0.109	0.312	0	1
主觀階級認同					
中上 / 上層階級	9005	0.08251	0.275155	0	1
中層階級	9005	0.372238	0.483428	0	1
中下 / 下層 / 勞工階級	9005	0.51005	0.499927	0	1
調查時受訪者年齡	9005	43.229	14.865	3	93
1970後出生世代	9005	0.419	0.493	0	1
實質每月所得	9005	24514.030	31435.500	0	536677.4
實質每月所得對數	6006	10.250	0.748	7.672	13.193

附表2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2、1997、2002、2007年匯總數據中主要變量的簡單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政府單位	0.19*													
(2) 1970年後世代	0.04*	-0.01												
(3) 女性	-0.23*	-0.07*	0.03*											
(4) 已婚	0.08*	0.03*	-0.25*	0.03*										
(5) 受訪時年齡	-0.10*	-0.04*	-0.75*	-0.05*	0.04*									
(6) 教育年限	0.38*	0.22*	0.03*	-0.07*	-0.01	0.02								
(7) 大學文憑	0.18*	0.20*	-0.10*	-0.02*	-0.08*	0.18*	0.47*							
(8) 國民黨員	0.15*	0.25*	-0.03*	-0.16*	0.09*	-0.03*	0.16*	0.05*						
(9) 社團參與	0.09*	0.07*	-0.09*	-0.11*	0.14*	0.04*	0.05*	0.00	0.10*					
(10) 外省族群	0.12*	0.09*	0.03*	-0.03*	-0.02*	0.16*	0.14*	0.18*	-0.03*					
(11) 原住民	-0.06*	0.01	0.02	0.03*	-0.03*	-0.01	-0.04*	-0.02*	0.04*	-0.01	-0.04*			
(12) 父親為雇主	0.04*	-0.01	0.04*	-0.01	-0.23*	0.04*	0.12*	0.08*	-0.04*	-0.01	-0.05*	-0.02*		
(13) 父親政府雇員	0.15*	0.14*	0.03*	0.01	-0.01	-0.05*	0.19*	0.16*	0.10*	-0.01	0.28*	-0.01	-0.21*	
(14) 時間連續變量	-0.03*	-0.06*	0.07*	-0.02	-0.54*	0.27*	0.04*	0.14*	-0.15*	-0.10*	-0.03*	0.03*	0.29*	-0.02*
階級位置														
非技術工人	-0.19*	0.09*	0.11*	-0.00	-0.03*	-0.19*	-0.06*	-0.15*	0.02*	-0.04*	-0.02*	0.06*	-0.08*	-0.12*
自雇者	-0.16*	-0.11*	-0.09*	-0.14*	0.12*	0.03*	-0.10*	-0.10*	-0.03*	0.11*	-0.06*	-0.02	-0.03*	-0.11*
專家技術工人	0.15*	0.21*	0.07*	-0.02	-0.05*	-0.07*	0.18*	0.18*	0.07*	0.01	0.07*	-0.01	0.01	0.08*
經理人	0.19*	0.08*	0.05*	-0.12*	0.04*	-0.09*	0.17*	0.04*	0.11*	0.04*	0.05*	-0.02	0.01	0.06*
專業經理人	0.20*	0.12*	0.02*	-0.09*	-0.01	-0.00	0.14*	0.13*	0.07*	0.04*	0.10*	-0.02*	0.03*	0.10*
小雇主	0.16*	-0.07*	-0.00	-0.11*	0.06*	-0.02*	0.05*	-0.01	-0.01	0.11*	-0.02	-0.01	0.04*	-0.01
資本家	0.17*	-0.04*	-0.02*	-0.09*	0.04*	-0.01	0.06*	0.02	0.00	0.06*	-0.00	-0.01	0.03*	0.02

註：表中為簡單相關係數，* p<0.05。

參考書目

- 大前研一，2007，《M型社會：中產社會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台北：中信出版社。
- 文崇一，1989，《台灣的工業化與社會變遷》。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行政院主計處，2007，〈第4表 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與所得差距〉。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5/a11/Year04.doc>，取用日期：2008年6月12日。
- 行政院主計處，2008，〈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533&ctNode=543>，取用日期：2008年6月12日。
- 行政院主計處，2009，〈總體統計資料庫〉。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L.asp>，取用日期：2009年5月6日。
- 吳乃德，1997，〈檳榔與脫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 137-167。
- 吳介民，1996，〈同床異夢：珠江三角洲外商與地方之間假合資關係的個案研究〉。頁176-218，收錄於李思名等人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面面觀》。台北／香港：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與浸會大學林思齊研究所。
- 呂玉瑕，1994，〈城鄉經濟發展與已婚婦女就業——女性邊緣化，Female Marginalization，理論試探〉。《人口學刊》16: 107-133。
- 呂玉瑕，2001，〈性別、家庭與經濟：分析小型家庭企業老闆娘的地

- 位〉。《台灣社會學》2: 163-217。
- 呂玉瑕，2009，〈家庭存活策略與女性勞動參與選擇：以台灣家庭企業婦女為例〉。《臺灣社會學刊》42: 95-141。
- 呂玉瑕、伊慶春，2005，〈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台灣七〇年代與九〇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台灣社會學》10: 41-94。
- 李宗榮，2007，〈在國家權力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絡再探〉。《台灣社會學》13: 173-242。
- 李悅端、柯志明，1994，〈小型企業的經營與性別分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 41-81。
- 李碧涵，1994，〈台灣地區後工業轉型之國家與社會〉。《中山學術論叢》12: 245-282。
- 李碧涵，1996a，〈台灣企業經濟之結構調整與後工業轉型〉。《中山學術論叢》14: 81-121。
- 李碧涵，1996b，〈台灣的公營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之問題〉。頁39-69，收錄於徐正光與蕭新煌主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林宗弘，2007a，〈民主與威權的制度績效：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的量化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1(1): 3-67。
- 林宗弘，2007b，〈城市中國的無產化：中國城鎮居民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79-2003〉。《台灣社會學》14: 101-153。
- 林南，1997，“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Pp.103-145，收錄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合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柯志明，1993，《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孫清山、黃毅志，1996a，〈台灣階級結構：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頁57-101，收錄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合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孫清山、黃毅志，1996b，〈台灣地區經濟教育發展與職業取得之變遷〉。頁429-475，收錄於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新領域》。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高承恕，1999，《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晉芬，1992，〈冷漠的員工、乏力的工會：由勞動市場的觀點分析工會的運作〉。《中國社會學刊》16: 55-88。
- 許嘉猷、黃毅志，2002，〈跨越階級界限？：兼論「黑手變頭家」的實證研究結果及與歐美社會之一些比較〉。《臺灣社會學刊》27: 1-76。
- 許嘉猷主編，1994，《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台北：群學出版社。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10: 1-40。
- 章英華、黃毅志，2007，〈台灣地區教育分流對階層位置影響之變

- 遷：1997年與2005年的比較〉。論文發表於「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十一次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民國96年12月21-22日。
- 黃志隆，2005，《就業保障與社會安全的制度重組——台灣的後工業困境與出路》。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富三，1977，《女工與台灣工業化》。台北：牧童出版社。
-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熊瑞梅、黃毅志，1992，〈社會資源與小資本階級〉。《中國社會學刊》16: 107-138。
- 蔡明璋，1996，《台灣的貧窮：下層階級的結構分析》。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蔡明璋，2006，〈理事長演講：社會學與公共影響力：新政策社會學的願景〉。《臺灣社會學刊》37: 1-31。
- 蔡淑鈴，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17: 47-88。
- 蔡瑞明，1997，“Leaving the Farmland: Clas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頁15-55，收錄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合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蔡瑞明，2008，〈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一個倒U字形的發展趨勢？〉。頁137-176，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台北：群學出版社。
- 鄭陸霖，2004，〈擁抱後工業的實踐想像——《後工業機會》導讀〉。頁1-35，收錄於Fred Block，《後工業機會：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

- 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 蕭新煌編，1989，《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蕭新煌，1994，〈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台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頁73-108，收錄於許嘉猷主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謝雨生、余淑嬈，1990，〈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及其流動〉。《中國社會學刊》14: 31-63。
- 謝雨生、黃美玲，2004，〈台灣不同社會階級家庭子女教育取得的家庭效應〉。頁237-270，收錄於劉兆佳等編，《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社會階級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 11-54。
- 嚴祥鸞，1996，〈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化分工的解析，1951-1994〉。《勞資關係論叢》5: 147-175。
- 蘇國賢，2008，〈台灣的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之長期趨勢〉。頁187-216，收錄於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主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
- 龔宜君，2005，《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出版。
- Agresti, Alan, 2002,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 Babb, Sarah, 2005,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cent Evidence and Current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199-222.

- Baron, Paul, and P. 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rett, Richard E. and Martin King Whyte,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 1064-1089.
- Beck, Ulrich, 2000, *What is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England]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Becker, G., 1964, *Human Capit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ll, Daniel,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Bian, Yanjie and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739-758.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6 [1983],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75,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urawoy, Michael, 2005[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nese edition. Taipei: Socio Publish.
- Castells, Manuel, 2000a,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2000b, *End of Millennium*. 2nd E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Chan, Tak Wing and John H. Goldthorpe, 2007, "Class and Status: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Its Empirical Relev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512-532.
- Chang, Chin-fen and Paula England, 2009, "Gender Inequality in Earnings in Industrialized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pring Meeting of RC28,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eijing, May 13-16.
- Chu, C. Y. Cyrus, Yu Xie and Ruoh-rong Yu, 2007, "Effects of Sibship Structur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Intra-Family Resource Transfer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0: 91-113.
-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 Deyo, Frederic 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jilas, Milovan, 1983,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DiMaggio, Paul and John Mohr, 1985,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arital Selec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6): 1231-1261.

- DiPrete, Thomas A., 2002, "Life Course Risks, Mobility Regimes, and Mobility Consequences: A Comparison of Swed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2): 267-310.
- Edwards, R. C.,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xford: Pol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irebaugh G., 2003, *The New Geography of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9,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ldthorpe, John H., 2002, "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Clas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5(3): 1-28.
- Gorz, André, 1985,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Gorz, André, 1994,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G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London: Macmillan.
- Gray, John, 1998,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New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Englan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ary G.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on Economic Sociology* 94: S52-S94.
- Held, Davi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ndrickx, J. and H. B. G. Ganzeboom, 1998,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1920-1990. A Multinomial Logistic Analy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 387-403.
- Hirst, Paul, and Grahame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Second edition.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Hite, Amy Bellone, and Jocelyn S. Viterna, 2005, "Gendering Class in Latin America: How Women Effect and Experience Change in the Class Structur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40(2): 50-86.

- Hout, Michael, 1980, *Mobility Tabl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Hout, Michael, Clem Brooks and Jeff Manza, 1995,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199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805-28.
- Hu, Alfred, Thung-hong Lin and Raymond Wong, 2009, "Class and Ethnic Cleavages in Electoral Politics: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Taiwan Since 198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pring Meeting of RC28,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eijing, May 13-16.
- Huber, Evelyne and John D. Stephens,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rbo, Harold R., 2006,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Class Conflict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McGraw-Hill.
- King, Lawrence Peter and Iván Szelényi, 2004, *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onrád, Gyorgy, and Iva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oo, Hagan, 1990, "From Farm to Factory: Proletarianization in Ko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5): 669-681.
- Korpi, Walter, 1978,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orpi, Walter,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orpi, Walter and Joakim Palme, 2003, "New Politics and Class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Austerity and Globalization: Welfare State Regress in 18 Countries, 1975-95."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3): 425-446.
- Leiulfsrud, Håkon, Ivano Bison and Heidi Jensberg, 2005, *Social Class in Europe*. 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olitical Science,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Norway,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rento, Italy. <http://ess.nsd.uib.no/files/2003/ESS1SocialClassReport.pdf> (Date Visited: April 4, 2006).
- Lin, Thung-hong, 2007, "Globalization versus Classes: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Hong Kong, 1991-200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ong Kong, December 6-7.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u, J. and A. Sakamoto, 2002, "The Role of Schooling in Taiwan's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Screening, or Credential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9: 1-56.
-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 Marx, Karl, 1977, *Capita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Marx, Karl and Fredrik Engels,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Milanovic, Branko, 2005,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liband, Ralph, 1977,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Penn World Table 6.2, 2006, "Penn World Table, PWT." In *PWT*, 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2/pwt62_form.php (Data visited: April 25, 2008).
- Perrucci, Robert and Earl Wysong, 2003, *The New Class Society: Goodbye American Dream?*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Piore, Michael J. and Charles F.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 Popper, Karl R., 1991,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Portes, Alejandro and K. Hoffman, 2003, "Latin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s: Their Composition and Change during the Neoliberal Er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1): 41-82.
- Reich, Robert B.,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A. A. Knopf.

- Robinson, William, I., 2004,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Baltimore, M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y, William G., 1984, "Class Conflict and Social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483-506.
- Rudra, Nita,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2): 411-445.
- Scruggs, Lyle and Peter Lange, 2002, "Where Have All the Members Gone?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Union Dens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4(1): 126-153.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zelényi, Iván,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Pp. S287-S326 in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edited by M Burawoy and T Skocp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zelényi, Szonja, 1987, "Social Inequality and Party Membership: Patterns of Recruitment into the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5): 559-573.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Thurow, Lester C., 1999, *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New York, NY: Harper Business.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Treiman, Donal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rotsky, Leon, 1973,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edited by Naomi Allen et al,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 Tsai, Ming-Chang, Gang-Hua Fa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Hong-Zen Wang, 2008, "Profiling Middle-Classes in Today's Taiwan." Manuscript.
- Tsai, Shu-Ling and Yossi Shavit, 2007, "Taiwan: High Education — Expansion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Pp. 140-164 in *Strat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edited by Yossi Shavit, Richard Arum and Adam Gramor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US Census Bureau, 2009, "Table 572. Civilian Labor Force and Participation Rates." In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tables/09s0572.xls> (Data visited: May 8, 2009).
- Wade, Robert, 2004[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ton, John,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89-108.
- Wang, Hong-zen, 2002, "Class Structur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in the Initial Post-war Period." *The China Journal* 48: 55-85.
- Weber, Max, 195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ng, Raymond Sin-Kwok, 1996,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 Czechoslovak and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1980s.” *Social Force* 75: 61-89.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right, Erik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k Olin and Bill Martin,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 1-29.
- Wright, Erik Olin and Donmoon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weden, and Norwa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 85-102.
- Wright, Erik Olin and Joachim Singelmann, 1982, “Proletarianization in the Changing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88: S176-S209.
- Wu, Xiaogang, 2002,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 80(3): 1069-1099.
- Xie, Yu and Xiaogang Wu, 2008, “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in press].
- Yu, Wei-hsin, 2009, *Gendered Trajectories: Women, Work and Social Changes in Japan and Taiw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4, “On one’s own: self-employment activity in Taiwan.” Pp.388-425 in *The Reemergence of Self-*

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R. Arum and W. Mül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8,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in Taiwan: The Case of a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 Forthcoming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Late-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edited by Hiroshi Ishida. The 2005 SSM Research Series, Volume 14, Sendai, Japan: The 2005 SSM Research Committee.